

全球对话

9.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种语言刊出

访谈 郇庆治

Christine Schickert

巨变
75年后

Brigitte Aulenbacher
Andreas Novy
Fred Block
Margaret R. Somers
Antonino Palumbo
Alan Scott
Gareth Dale
Jonathan D. London
Attila Melegh
Chris Hann

纪念

Ann Barden Denis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Angela Miles
Marilyn Porter

迁徙

Karin Scherschel
Gerda Heck
Carlos Sandoval
Bediz Yilmaz
Sarah Schilliger

理论视角

Julia Kaiser
Jasper Stange

塞内加尔社会学

Moustapha Tamba
Souleymane Gomis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Samba Diouf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开放论坛

> 让女性权利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DISCOURSES
Le Discours

第9卷 / 第3期 / 2019.12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主编的话

全球北方和南方最近在气候变迁和生态危机的辩论相当激烈。中国北京的比较政治学教授郇庆治是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解释了在中国的辩论，以及环境政策和环境保护的取径如何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变化。

波兰尼的著作《巨变》于1944年出版，也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研究相关议题的滥觞。全球对话编辑团队和波兰尼全球学会的会长 Andreas Novy 共同举办的第一届研讨会，庆祝著作问世75周年，Fred Block, Gareth Dale, Chris Hann, Margaret R. Somers 等研究波兰尼的学者对不同且广泛的主题进行发挥与论述，反思《巨变》相关的知识背景，讨论其观点对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有了一番精辟剖析。

Ann Barden Denis 于2019年2月过世，她是杰出的社会学家，且是ISA的活跃参与者，Linda Christiansen

Ruffman, Angela Miles, Marilyn Porters 为文纪念这位学者。

第二部份由Karin Scherschel带领汇整了移民问题的讨论文章，虽说是有关长远历史的主题，但是最近几年重新浮上台面，不同国家的作者探讨其原因，难民的处境，争议性的法律，还有公民社会。

面向未来的星期五联盟是抵抗气候变迁的社会运动组织之一，新生代年轻人不安地面临着全球生态灾难。Julia Kaiser 和 Jasper Stange 探讨了跨阶级的动员的取径策略，可谓独树一帜。

开放论坛的Bengi Sullu参加ISA的联合国青年会议，向大家报告了出席的女性地位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的来龙去脉与精华。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的主編

全球對話以17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编辑团队

主编: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编: 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顾问: Michael Burawoy.

编辑顾问 Juan Lejárraga.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dji,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ïda Zine.

阿根廷: Alejandra Otamendi, Juan Ignacio Piovani, Martín Di Marco,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u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Md. Eunos Al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Lucas Amaral Oliveira,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国/西班牙: Lola Busuttill.

印度: 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hsan Pournnejati.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ko Masu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Shogo Ariyoshi, Kazuma Kawasaki, Sae Kodama, Koki Koyanagi, Tatsuhiko Ohata, Shunji Sugihara, Ryo Wakamatsu.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Aleksandra Biernacka, Iwona Bojadżijewa, Katarzyna Dębska, Monika Helak, Sara Herczyńska,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Adam Müller, Weronika Peek, Zofia Penza-Gabler, Jonathan Scovil, Marcjanna Szczepaniak, Agnieszka Szypulska, Aleksandra Wagner.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Luciana Anăstăsoaie, Cristian Chira, Alexandra-Ioana Dragomir,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Mihai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Dan Gitman, Iulia Jugănar, Ioana Mălureanu, Bianca Mihăilă, Rareş-Mihai Muş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Alina Cristina Păun, Codruţ Pînzaru, Susana Maria Popa, Adriana Sohodoleanu, Gabriela Stoian, Maria Stoicescu, Maria-Cristina Titea, Carmen Eugenia Voinea.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Karl 波兰尼的巨著《巨变》于 1944 年出版，记载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历史。这是一本对历史和未来的剖析作品，环绕在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期我们庆祝这本开创性著作出版 75 周年，像是关于 Polanyi 作品的历史，观点，和方法。



迁移不是独立的社会事件，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结果，包括了权利，政治，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全球化，和限制移民。本期文章融合了历史去解释移民原因，情况，聚焦在争议性的政治法规，以及和公民社会的参与



这期杂志我们用社会学理论和经验资料去解释和分析赛内加尔学校制度，例如法阿拉伯私人学校和公立学校，还有和宗教的关系为何。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 谈论社会学

生态社会主义：访谈邹庆治
Christine Schickert, 德国 5

> 巨变 (75年后)

巨变75年
Brigitte Aulenbacher, Andreas Novy, 奥地利 9

波兰尼的巨变75年
Fred Block 和 Margaret R. Somers, 美国 11

市场作为国家统治技艺：波兰尼的观点
Antonino Palumbo, 意大利, Alan Scott, 澳大利亚 13

波兰尼，会计，超越GDP
Gareth Dale, 英国 15

巨变：市场化东亚
Jonathan D. London, 荷兰 17

人口替代的恐惧
Attila Melegh, 匈牙利 19

迈向民粹之路
Chris Hann, 德国 21

波兰尼的遗产
Andreas Novy, 奥地利 23

> 纪念

纪念Ann Barden Denis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Angela Miles,
Marilyn Porter, 加拿大 25

> 迁徙

迁移，流动
Karin Scherschel, 德国 27

想象的欧洲，现实的非洲
Gerda Heck, 埃及 29

中美洲大逃亡：21世纪出埃及记
Carlos Sandoval, 哥斯达黎加 31

难民作为不自由的劳动力：土耳其的启示
Bediz Yilmaz, 土耳其 33

团结城市的去边界
Sarah Schilliger, 瑞典 35

> 理论视角

走向未来的学生：迈向生态阶级政治
Julia Kaiser 和 Jasper Stange, 德国 37

> 塞内加尔社会学

塞内加尔宗教领导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Moustapha Tamba, 塞内加尔 40

塞内加尔的世俗私人教育
Souleymane Gomis, 塞内加尔 42

塞内加尔法语阿拉伯学校的策略转型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塞内加尔 44

塞内加尔教育系统的社会学考察
Samba Diouf, 塞内加尔 46

塞内加尔的民办天主教教育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塞内加尔 48

> 开放论坛

让女性权利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
Bengi Sullu, 美国 50

“团结的口号动员了所有的城市居民，召唤了乌托邦的想象。乌托邦是有可能超克政治限制，透过将移民问题与社会政策问题联系起来，而非互相对立。”

Sarah Schilliger

> 生态社会主义

采访郇庆治

郇庆治是中国北京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也是 2002-3 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院访问学者；2005-6 年他他是德国曼海姆大学的洪堡研究员，研究聚焦在环境政治，欧洲政治，左翼政治。著述并编辑了许相关书籍，包括 2000 年出版的《欧洲绿党比较研究》和《生态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学》，2010 年出版的《重构现代文明的基础》。

他接受了德国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的后成长社会研究小组行政小组组长 Christine Schickert 的采访，其同时是《全球对话》的助理编辑。



郇庆治。来源：FSU Jena.

CS： 在全球北方气候变迁是人们喜爱谈论的政治问题。可以请你已一下这个讨论在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何呢？

郇： 自从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迁框架公约》开始，全球气候变迁就是全球环境政治的主要问题，至今已经有一段时间。中国就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迁的立场相当明确与一致，就是“求同存义的责任原则”（CBDR）：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气候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或危机，不仅仅影响已开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已；再者，所谓的已开发国家像是欧盟和美国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或移转必要的资源和技术，负起历史责任。最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按照其经济成长为全球气候变迁的的解决贡献心力。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历来来参与国际气候变迁的政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2 年之前，1992-2012 年，2012 年至今。到 2012 年为止的主流共识是盟国家和美国这样的已开发国家要采取比较多的行动。但是自 2012 年以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迁框架公约》框架下已经逐渐聚焦在国际气候变迁合作上。很好的例子是中国在《巴黎气候公约》中的角色。

事实上中国立场转的动力并不是莫

>>

基在《巴黎气候公约》的签署和执行，反而是源于国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国家策略。简言之，像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旨之一就是现代化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然后要积极地参加气候变迁的国际合作项目，这象征了政治上的理想性。例如，中国参与了2019-20年度的相关国际活动，越来越关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实行。

CS: 环境保护在中国早就不是新问题。1972年，不像他社会主义政党所领导国家，中国毅然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中决定许多环保原则。你能否描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呢？

郇: 说得好，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始于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中国于是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并成立了负责国家代表处专职处理这一个问题。从此中国的环境政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73-89年，1989-92年，1992-2012年和2012年至今。

第一阶段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下，环境保护很快就变成明确的政策问题，所以“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在1983年被正式核准，至今一直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关键政策之一。第二阶段是在江泽民的领导下让永续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生态与环境治理的主要战略。而从2002年到2012年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于2005年提出了“两型社会建设”（节约能源，环境友善）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当时核心概念。2007年“生态文明建设”一词被列入中共十七大的工作报告之中。自2012年以来，变的不是“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政治生态与环境治理战略的一环，而是环境保护与治理被看成是主要追求的目标，是“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象征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CS: 很长一段时间你的工作聚焦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观念上，你认为不但“绿化”资本主义不是当前生态危机的出路，“绿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也不是答案。所你可否跟我们解释一下生态社会主义？

郇: 简单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绿色政治哲学，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生态环境挑战不仅是地方，国家，还是全球的，并且在当代资本主义霸权下凸显其重要性，不是局部问题，而且与认识框架本身息息相关，也就是资本主义霸权的资本扩散和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政府采取的各种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并不能根本地解决环境问题。不过如Ulrich Brand和Markus Wissen在他们的《The Limits to Capitalist Nature》一书中很清楚说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绿色资本主义”完全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可能（不过有的话也是选择性实施）。

另外一个层面上，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或是说，是社会主义的进化版，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简化或假的绿色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理想，到今天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今天的中国都没有被实现。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此一理想也无法在世界任何国家被实践。这就是说我们提出的是一种当代世界的生态社会主义，而不是替代性的社会主义。易言之，生态社会主义者今日的主要任务是搞清楚为什么资本主义政府无法解决那些被宣称可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各种生态社会主义，不论是真实的或激进的替代版本，都可以有办法解决问题，让“另一个世界成为可能。”

CS: 在我看到许多论述中都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其不仅为生态危机提供了解决办法，还解决社会不平等，目标是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但是你却认为生态

>>

社会主义目前没什么吸引力，为什么会这样呢？

郇：生态社会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预期般的流行。我想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个不正常的现象。第一是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仍受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传统社会主义名誉不佳的极大影响，像是 Saral Sarkar 在其书《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中说的，传统社会主义和价值观在无法令人满意地处理环境问题。第二，19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集团瓦解后，全球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在宣传上相当成功，使大多数人相信历史已经终结。有趣也遗憾的是2008年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没有带给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在内的激进或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带来比较好得的结构环境。近年来“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普及是证据。

还有，以中国为例，“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可说明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传统的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态。一个歧异是在于社会主义是否是当今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现代化的制度前提。若从生态马克思主义来看，美国和欧盟角色的过度强调可能忽视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改造工程投下变量。

CS：生态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愿景要如何增加吸引力？

郇：对生态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毫无疑问是紧急又有挑战性的工作。第一，社会主义或是绿色左派政党是可以让生态社会主义让公众更受欢迎和更有吸引力的主要力量，因为其可以发挥的地方很多，像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可以看到选民，特别是年轻族群在相当支持候变迁和全球环境问题，不过整体上的左派并没有拿到比较多票。第二，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展开学术界中生态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全球对话与合作。这当然是说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平起平坐，携手合作。平心而论，过去的几十年中国一直在努力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

一直是学习西方的“模范生”。但现在开始中国要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独立和反思的角色，真正帮助让中国变得更好。第三，若生态社会主义要在中国更具吸引力，那关键之一就是使“新时代具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有吸引力。我想关键还是有意识地宣传

CS：您可以区分“壮大经济”和“追求成长的经济”，后者取决于持续的经济成长而无法解决生态危机。这种区别对中国来说意义为何呢？

郇：我2008年使用“追求成长的经济”理论化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彰显我和希腊思想家 Takis Fotopoulos 的不同，后者说的是看持续发展是否与全球化并存去解决问题。我们看看中国的发展就知道，就合法性来说，资源可取得性和环境的永续性而言，中国在21世纪初的经济成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需的和可辩护的。不过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改变很大，与美国的贸易战也让当前中国面临更大挑战。

相关问题真正的挑战是中国经济是否是 Takis Fotopoulos 定义的追求成长型经济体。我认为个问题仍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一来自2015年以来中国年经济增长率为6-7%，是十年前（2005年为11.4%）将近一半，显示中国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进行改善，至少对于中国中西部保持适当的经济成长率是必要的工作。再来若考虑到中国的现在经济，跟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的经济总体为13.608万亿美元，是全球的15.86%，若年成长率只有5%也是很可观，并对生态环有巨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贡献世界的潜力的，因为其以同时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和也保护生态环境的，我们需要更多生态主义和更多的社会主义。

CS：在欧洲和北美，绿色资本主义是对生态挑战的主流响应。我们从你提勾勒的愿景中可以获得什么？

郇：“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可说是欧洲和北美面对生态挑战的

>>

“理性”的务实取径，这是由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阶层化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结果，而“已开发”国家设法利用全球资源去保持自己优势。此一结构若持续下去，那么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世界不太可能实现。

然而，这样的结构持续在社会和生态制造麻烦与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美国和欧洲国家想要维持国际秩序的现状变得比较困难了，因为威胁到西方国家的霸权宰制。易言之，是越来越不可能让这些“先进”国家同时维持在地良好环境的同时继续享有“生态资本主义”的绿色模式。某种程度上，以美国带领的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摩擦可以从这个观点来理解。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不同的角度相当认真看待生态问题，这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对于“肮脏”资本和技术有越来越严格的标准，遑论对于废物

和垃圾的清理，这点从菲律宾和加拿大之间关于废物进口的争议可以清楚看到。

总结以上两点，我想生态社会主义可让欧洲和北美国家认清“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局限和不足的事实，让其他人付出代价去解决西方世界的问题这样的行为必须停止，我们也必须尽快开启社会生态转型，毕竟，干净的环境是平等社会的前提。■

來信寄給鄒慶治 <qzhuan@sdu.edu.cn>

> 巨变75年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奥地利, ISA经济与社会(RC02), 贫穷、社会福利、社会政策(RC19), 工作社会学(RC30), 女性、性别、社会(RC32)研究委员会委员, Andreas Novy,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U), 奥地利



波兰尼的《巨变》一书重要性可以在其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被印证。来源：Ana Gomez。

巨变是波兰尼的巨著，其于1944年出版，他看到了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世界变迁与发展，重写了二次战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史，重要事件包括了1929年的大萧条，法西斯主义抬头，社会主义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组，以及新政的影响。

《巨变》研究的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事件如何在这样的脉络中展开，此脉络事由“自我调节市场”（《巨变》）的“自由信条”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由需求，供给，价格和，利润所构成的系统，而这样的系统中，“人类社会是经济系统的子集合”（《巨变》），其他部份集合包括了生产过的要素，土地（自然），劳动力，货币，包括“虚拟货币”在内，后来变成了“商品：”“劳动和土地只不过是每个社会中人类本面对自然环境，若将市场机制导入意味着将社会的本质等同于市场的本质”（《巨变》），于是最终会“毁灭”（《巨变》）。波兰尼分析的“双重运动”包括“市场运动”和“社会运动”（劳工运动，政治立法，社会保护），其结构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因此获得安全与保障。

Michael Burawoy 在2014年于横滨举行的ISA世界大会的演讲中强调了《巨变》的重要性，论及了1970年代（1989年后共产主义崩溃后全球划时代）所掀起的新的“市场化浪潮”、2007-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雨后春笋的抗议活动，这总结起来可以被概括描述为波兰尼笔下的双重运动。的确如此，特别是我们看到1990年以来人们对波兰尼的作品可说相当感兴趣，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都争相引用参考其“双重运动”的研究，挪用他的“虚拟商品”的概念。他们另外还重新发现了“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精辟见解，和“自由主义”的独门看法。工业文明史上“当自我调节市场的乌托

邦成为过往云烟的时候

”，公平与正义自然就会降临人间（《巨变》）。

本其杂志欢喜庆贺《巨变》出版75周年，收录文章谈到了波兰尼个人的历史，学术，和方法论。Fred Block 和 Margaret R. Somers 分析波兰尼的著作时，特别从新自由主义者海耶克和西斯主义的的角度去诠释，聚焦对理解当今威权主义的当代意义。Antonino Palumbo 和 Alan Scott 超克国家与市场二分化约，解释国家和市场的牵手合作。Gareth Dale 对国民所得会计的历史进行了批判性的回顾，考察利润为基础的经济秩序，然后以此为基础去对波兰尼的“超越GDP”辩论进行颇吸，而 Jonathan D. London 研究东亚的巨变，归因到市场化和福利政策一起出现的吊诡。Attila Meleghe 和 Chris Hann 结合了对波兰尼当时的研究和右翼民粹主义去思索欧洲移民的当代议题。最后，Andreas Novy 强调波兰尼的知识遗，对社会运动研究的启发，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另类乌托邦的追寻。■

來信寄給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Andreas Novy <andreas.novy@wu.ac.at>

> 波兰尼巨变75年

Fred Blo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美国, Margaret R. Som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美国



波蘭尼在一次大戰。來源：Kari Polanyi Levitt

1964年波兰尼过世的时候其贡献显为人知，只有经济人类学家和希腊和罗马古代的学者们才知道这个人。他是难民知识分子，曾旅居奥地利，英国，美国，加拿大，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研究包括历史，地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古典研究，所以其追随者和粉丝太过于分散，无法成为享誉声望的难民知识分子。

此外，波兰尼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巨变》被用来证明是不可靠的先知。最后几章中他说到世界已经知道建立全球市

场的想法是错的，但是，二战后经济的“镶嵌自由主义”没有像战前金本位那样具有破坏性。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是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主流，但离波兰尼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还差得很远。况且波兰尼没有看到到冷战，也没有预测到华盛顿要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野望，好让商品和资本可以自由流通全世界。

讽刺的是，其去世后发生的事件反而巩固了波兰尼的名声。波兰尼于1920年代的维也纳开始形塑自己的思考，反对Ludwig von Mises和学生海耶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波兰尼去世十年后，海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利伯维尔场经济政策的理论导师。但是过去四十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让波兰尼从没人知道到变成最有名的思想家。

> 金本位和法西斯主义

波兰尼在《巨变》一书明确地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国际金本位体制，这里指涉了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种光谱的政治人物。可是一旦对经济弱势的人执行金本位紧缩政策，社会主义者和政治自由主义者都会起身反对，因为其对工资和公共支出的压缩，还有对民主的危害，这让反对得以可能。

银行家和大多数雇主认为金本位是自然经济规则的体现，擅自更改这个规则会导致经济的灾难。他们论点很大的机会会被看成自私自利，且von Mises和海耶克的论正式一种对日益增长的经

>>

济不平等和失业的辩护，要求政府不要介入。对于波兰尼来说，他们的说发既残酷且不道德，政策害人害己。你可以想象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可以接受经济痛苦，这不可能，况且其中大多数家庭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原著。波兰尼也支持工人投票，够用的工资，失业救济金，这些都被擰节受阻，结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幻灭，这是因为金本位限缩了人民权利。

法西斯主义政党充分利用这种虚幻承诺去拒绝提供适度的安全举措，所以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者不让任何进步计划实施，管理，或是控制，这让法西斯主义不可避免的会赢得升力。”不过掌权之后的希特勒便无视金本位的限制，马上刺激就业，所以最后纳粹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巩固其独裁统治。

> 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威权主义

现在的情况至观重大，40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就发明了一种永久擰节的政策去阻止政府介入提升就业率或保护家庭免于受到市场波动的危害，若政府考虑要去挑战就会让主权债务的市场抛售持有债务和外部资本报复，所以希腊激进左派政府当初是靠反对擰节胜选的如今也被欧盟强迫实行严格的擰节政策。

民主制度已经幻灭了，永久擰解桎梏了民主。右派政党利用民主制度去的蔑视之然后壮大之。最后新生代的领导人使用“自由民主”模式，讲白了就是选举操纵，司法禁齋，压制自由媒体，

政治仇恨将“人民”与“他者”切开。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威权主义的当态样貌与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可是若是因为现在威权主义没有穿军服和制服而就安心了的话，这很愚蠢。历史相次不是比较的基准。波兰尼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是对金本位的霸权所造成的民主危机的结果。如今我们再次面全球经济引发的危机。现代威权主义者就像其先行者一样陷入了危机造成的真空之中，并且保护“被遗忘的人”的名义进而去迫害他们的“敌人”。

我们从中该学到的是说，全球经济改革的紧迫性可能会破坏掉永久擰节，并化解无能民主的危机。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要去建立强大的全球改革运动。气候变迁让全球难民人数急剧增加，所以全球经济陷入无秩序的危机，要谈全球合作简直如愚公移山。不过现在全球绿色新政可能可以凝聚全球大多数人，因为其把资源从全球北方重新分配到全球南方，所以要解决气候问题，改变全球经济的制度和游戏规则。这个全球倡议将在国家和超国家内展开，更新民主政治，进行改革，创造以人为本的经济。

來信寄給 Fred Block <flblock@ucdavis.edu>

Margaret R. Somers <peggs@umich.edu>

> 市场作为国家统治技艺

波兰尼的观点

Antonino Palumbo, Palermo University, 意大利, Alan Scott,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澳洲, ISA都市与区域发展委员会委员(RC21)



波兰尼在Pickering, Ontario, 1950年代。
来源: Kari Polanyi Levitt.

把经济学家（正统）排除在外，我们会看到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就说完美市场竞争是不自然的人类行为。由此出发，这些学者奋力为主权国家辩护，为的是去证明国家干预市场是合理的。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这样的努力更为用力。主权国家的债务危机的基础前提上去采取撙节政策为的是去解决金融危机，国家行动主要包括两种：(i) 凯恩斯主义的介入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所作的政策干预；(ii) 以战后福利国家的乡愁为基础，采取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重分配政策。虽然这些普遍存在进步阵营内，可是不论概念或是执行上都不成功，因为其无法反驳被广为接受但是没什么正当性新自由主义主义，也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妥协。

> 国家作为市场的拥护者

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史和政治史并不支持这种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零和游戏。波兰尼的《巨变》(1944年首版)就是最好的论证。若我们总结波兰尼对自由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评，那就是为了实现市场社会，自由放任政策是一种政治，支持保护监管的社会意见是是对自然保护主义的自然结果。波兰尼认为使市场成为政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彻底扬弃政治经济学的二分。他认为国家既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行动者，也是拥抱市场预防发生危险的行动者。国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是的的确确的政治原因去增强国家权力，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和技术精英的霸权导致。

市场可以怎么样帮助国家增加主权？从波兰尼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得到灵感，就是市场能够通过使各个群体相互竞争来破坏个群体的关系。所以市场具有军事硬力量和软实力，靠的是破坏了社群的合作和自治，使国家可以有能力集

>>

权，不怕官僚主义的反抗。专制国家会对社会进行斗争，自由主义国家的与封建权威，中介，专业等斗争是目的。苏联军队对市场社会主义表现出的兴趣和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的拥护就是体现了这种逻辑。所以我们不该忽视各种市场模式去破坏那些积极抵制国家介入的那些公民团体的工具。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不同的是，波兰尼对市场的批评不是只看工人的剥削和（或）异化，而是关注理论上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的凝聚力降低，关系变得脆弱。

> 殖民的逻辑

追求这种集中化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国家在国内（殖民原住民和内部敌人）和国际上（国家的统治权强扩张到外国领土和人口）都是一种殖民。历史上来说这两者紧密扣连。外部扩张是国家减少市场改革产生的之内部社会冲突（亦即“社会问题”）的必备方式，这点可以从内部和外部殖民形式之间的相似触看出个中原因。国内层次上的国家是去巩固进程，要求经济精英分担利益与成本然后共谋。在国际层次，殖民国家靠的是殖民者去在地族群或社会精英的合作。两者都是用来建立的联盟，竞争，迫使其成员以自利的方式定期重新协商。因此经济和政治危机意味着责任转嫁给其他盟友，然后重塑市场机会，于是有了波兰尼所描述的监督和放松管制的景气循环。

> 重新连结社会与政治

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依存关以及策略脉络让这种以国家主要求国家介入且减少市场的论政治不仅肤浅且大错特错。事实上市社会对于国家的支持去采取紧急措施好让国家行重新协商过程中的有较多的议价能力。同样地，人们对主权货币的违约，加税，资本外逃的恐惧心里也被拿来消费加以利用，好增加谈判桌上那些的垄断经济和社会精英的权力。过去十年我们会看到新自由主义共识的联盟成员所采取的行动是让新自由主义共识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我们若要避免再度发生类似历史事件，需要的不是只有倡议穷人的福利政策，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必须与政治问题重新跨勾，也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民主化。波兰尼对社会权利和工业民主的强调无非就是这点，公民权力若要扩大民主范围就必须超出市场范围，包括扩大消费

者权益，法律监督机制，房地产的限制政策，而金融，环境，自然问题的会因为眼前经济利益被转嫁给后代，得承受新自由主义失败的去乌托邦，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恶果。■

來信寄給 Antonino Palumbo <antonino.palumbo@unipa.it>

Alan Scott <ascott39@une.edu.au>

> 波兰尼，会计，超越GDP

Gareth Dale,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英国



波兰尼在維也納，1923年。
來源：Kari Polanyi Levitt.

波 兰尼在辩论关于 Ludwig von Mises 对于社会主义会计的问题的时候这么说：“会计是对经济活动的量化描述。例如资本主义围绕着利益而打造，所以会计提供了资本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和利润之间关系的总体描述。一支军队的活动限于利用金钱和资源去达成军事目的，所以某种意义上其量化描述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控制的手段……”波兰尼也说道，就是会计的主要目的“简单来说就是会计必须提供量化的数据去解答我们所有关于经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质也决定会计的本质。例如，资本主义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

因此会计就是要以量的方式去分析其每个资本的不同组成与获利的关系。”

波兰尼在这篇文章中定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会计原则：利润。他并且用了军队的会计（“可以控制”）来说明。我们要简单讲一下，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会计辩论和转变开始讲起。其中一个就是波兰尼加入的社会主义会计辩论。另外就是国民所得估计的革命。而美国制度论经济学家 Wesley Mitchell 是开山祖师，其批评新古典理论是“质化的”，从而推动量化经济学，让经济学可以测量一切经济活动。

› 国民所得会计系统的诞生

波兰尼在1920年辩论社会主义会计前，Mitchell成立了国家经济研究所，其旨在系统化地收集资料，然后进行严谨的统计描述。Mitchell是现代国民所得会计的概念发明者之一，他用实际数字最为基础，并影响了Philip Mirowski在其著作《The Birth of the Business Cycle》中所谓的“新的理论单位”的概念。这著作作为经济学的总体经济革命（凯恩斯理论）以及国民生产毛额（GDP）铺路。1932年，美国国会委托Simon Kuznets给出了测量国家生产总额的公式，也因此带出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和GDP的概念。1930年代的Colin Clark试着用统计方法估算年度“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以及1936年1月的Jan Tinbergen发表的“号称第一个代表整体经济的动态模型”。

国民所得会计一开始是由改革派的想法，若政府要有效干预好解决大萧条问题，所需要的是统计。Kuznets的初衷是配合社会福利的所得会计，包括用“可以赚钱”去扣掉“不能赚钱”的像是军备。如Marion Fourcade在《Economists and Societies》中所说的，Kuznet和Mitchell的社会福利关怀被战争计划的紧迫性和凯恩斯总体经济学和需求管理理论的优先性所忽略了。Kuznet使用其在商务部所开发出来的国民所得会计系统去帮战争规划部规划军事管理适宜。军事支出，薪饷，军备费用被包括在GDP中，但是社会福利支出（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金）被排除在外。

› GDP的问题

GDP本质来说是从合法交易的交换价值的观点去测量经济活动。其“奖励”商品化：你唱一首歌无助于GDP提升，但是若要买票才可以听你唱歌就可以。GDP排除任何了没有金钱价值的劳动，像是家务，DIY，自愿性工作。这是对性别和阶级的歧视，忽略了收入分配。它也歧视自然，把自然资源当作商品，无视大自然破坏。

GDP因此是一种服膺交换价值的经济指标，是资本主义的工具。不过，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标准，用来描述“国民经济所得”的状况。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工具，不是对利润直接感兴趣，而是以资本利益的角度去管理社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军队的统计与计划不会与资本主义精神违背。

我们今天对于GDP的辩论可谓古今以来前所未见，“超越GDP”的呼声越来越约多，包括了无论是出于对增长的怀疑，出于对GDP增长缓慢的忧心，对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损害，所以政治人物和学者，像是Nicolas Sarkozy, Jacinda Ardern, Gus O’Donnell, Joseph Stiglitz, Amartya Sen都在呼吁要找出替代GDP的方案。

对于波兰尼主义的政治经济学David Yarrow而言，超越GDP的政治议程将是一个可以挑战市场中心的“经济”替代方案。如果真的可行，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GDP没有定义核心的经济目标，其目标只是竞争性积累资本，会计原则是公司管理原则，不是国治理的原则。如果是这样，那么当对只在乎成长的批评只针对GDP而又拥抱资本主义，那真正的原因将永远被掩盖掉。■

來信寄給 Gareth Dale
<Gareth.Dale@brunel.ac.uk>

> 巨变：市场化东亚

Jonathan D. London, Leiden University, 荷兰



波蘭尼。來源: Kari Polanyi Levitt.

全球市场的扩展和深化可说是种巨变。“市场化”就是意谓了这样的过程。几十年来全球市场透过“波兰尼”式的深化而蔓延开来，反映了市场化和的程度，也说明了精英政治目的是使社会生活服务于特定利益，成为工具。易言之，市场化大大造成了在地的后果，福利和不平等恶化可说是全球也是在地的现在进行式。

全球市场化伴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加，另外还有工业化，金融化，资本积累，不平等恶化等相关；像是不平等日益加剧，气候变迁造成的生态灾难等，资本主义的括成让这些国成相对容易，利益就是全球资本不断累积的动力。在世界上的市场化和“亲市场”原则掩饰了事实上是腐败的系统。这导致了全球化和政治腐败，造成社会不安全。此外，虽然平均收入增加和消费增加带来了财富，但不平等恶化了。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市场化其实是让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特别是在东亚。所谓东亚是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20多个国家。东亚市场化可以作为经验个案让我们去从事波兰尼式的巨变分析。

> 东亚的“双重运动”

市场化的倒数三十年来可说是涵盖了全球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发展最为显著。根据世界银行调查，1990年至2016年间，生活在“极度贫穷”的东亚人口比例从60%以上降至3%不到。然而这里的统计不包括东南亚相对较贫穷的市场社会。虽然有人会说贫穷线的标准人言人殊，但是区域这种日益不平等的现象还是明显的。东亚的高，中，低收入国家的市场化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但也让平等恶化，剥削的程度也相当严重。此外，东亚市场化也是“双重运动”的例证。

全球市场的特别有趣的一点是虽然新自由主义霸权不断扩张 (Dale, 2012)，不过一直这样下去，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社会政策会越来越大。中低收入国加和市场化的国家社会政策的扩展反映了全球化的市场社会或社会秩序的制度化的进程，也就是

>>

社会关系和制度形塑了两者。

东亚的这种双重运动之规模，范围，速度和复杂性让人吃惊，特别是考虑了不平衡的发展背景下的双重运动。放眼整个东亚会看到教育，卫生，社会保护的规模和范围大肆成长，包括公私领域都是。在韩国和台湾，甚至在泰国，印度尼和菲律宾，社会政策的扩张已因为选举进程很快，得利的是政治精英。相对较富裕的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其他不民主的国家很快就有教育，公卫和社会保护，但是贫穷也因此被巩固。在中国和越南等名义上的反资本主义的共产党拥抱市场社会，行使威权主义政治，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为人口提供了基础福利，这是超出政治和经济资本。柬埔寨，寮国，缅甸也是亦步亦趋。

〈双重运动的本质〉

放眼全世界来说，东亚发展作是波兰尼双重运动最好的铁证，也就是说，工业化比较慢开始的东亚被逐渐融入了全球市场，然后有相对应的社会政策。所以使得内部市场所需要的社会流动之所以可能产生。至于社会政策的全球进程上，Harris 和 Scull 指出事实上全球南方的商品化先发生于新自由主义之前，虽说新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动力，但是掩盖了“商品化”的真实过程。的确如此，国际劳工党报告指出2019年全世界会有一半的人口将受会于社会政策。

东亚社会政策扩张的怀疑论者认为的波兰尼双重运动的新自由主义者假扮的，这样的运动使东亚地区的人民扬弃普遍主义和反商品化原则，拥抱市场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公民身份。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双重运动其实是预设了透过市场机制可以促进社会福利，以及社会政策反过来也能够改善市场机制。结果就是不平等的恶化，商品化导致社会阶层化。事实上东亚地区的国家机器是资本积累的机器。

那么我们要如何进行东亚巨变呢？要怎么改善不平等（如果生活领域的不平等），要怎么增加收入，要怎么扩大社会政策的影响范围呢？

〈社会秩序的建立〉

东亚若要巨变，那我们就要对东亚国家的社会秩序进行分析，掌握其转型动态，讨论社会关系与制度。在韩国和台湾甚至可

以看到波兰尼所说的市场重新镶嵌。在中国和越南则是列宁主义的市场秩序的巩固带来了双重运动。放眼东亚的社会政策，市场已经透过社会分层而成为霸权。若更大一点来说，就是东亚精英建立了社会秩序和市场公民身份，普市主义社会政策的不足，虽然是有提供基本的服务，然而服务却和工资绑在一起，导致东亚不平等恶化，持续的经济不安全状况和生态灾难降低了生活质量，增加消费主义的弥漫，社会政策的普及，这些都是巨变的征兆，波兰尼可能不是这么希望，但是我们还是要乐观，不到最后关头不要放弃希望。■

來信寄給 Jonathan London
<j.d.london@hum.leidenuniv.nl>

> 人口置换的恐惧

Attila Meleg,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波兰尼中心创办人, 匈牙利

东欧之子波兰尼的理论验证了东欧人口现象。《巨变》解释为什么市场乌托邦许要“保护封套”去避免“虚构小说”，波兰尼另外也在1945年还论证利伯维尔场会在东欧激起民族主义的危险，他说：

“如果《大西洋宪章》要做的是去让利伯维尔场起死回生，那这样一来民族主义将重返让世界陷入疯狂。”（波兰尼，“普世资本主义或区域规划”）

Chris Hann 在其新书《遣返波兰尼》中指出“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便是欧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原因。在这文中我想说的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包括欧洲，东欧（特别是匈牙利）就是要去建立全球市场乌托邦。但是这些地区的国家跟外国资本说不，反而用移民或是逃离的难民去取代国内的劳动力人口。

> 全球因素

198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见证全球人口急剧变化的社会过程，于是让移民成为一种所谓的社会议题。

- 迁徙的速度在全球化时代超过人口增加的速度，但是生育率却持续下降，少子化加上人口严重老化。然后死亡率却是呈现放缓成长的趋势。

- 资本流动增加造成了移民人口流动增加，资本流动性也让公民社会失去根

基。经济结构因此失调，不确定性增加，工作和家庭生活变得稳定，导致安全感的低落。

- 福利国家兴起和劳动竞争的关系，移民的争论是相当机动的（特别是移民控制和历史）。要怎么说明这种现象？如上所言，生育力降低，人口老化，年轻劳动力参与率下滑，低薪，跨国精英也没有赚比以前多，所以 Böröcz 在2016年关于“全球再分配中的不平等”一文中说道，1990年代中期开始重分配的功能已经不再有效。

> 欧洲因素

与全球平均比较起来，欧洲生育率是低的，老化速度也快，失去了大陆地区的一些原本该有的优点，这代表了人口是在欧洲的移民议题上面越来越显著，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移民与福利竞争论述高度关联，资本的流动性很高（外国直接投资的金额是超过全球平均的）。为了要让流动性增加，社会主义经济体被改变，导致了失业，人口出走，社会不稳定等问题。还有全球平均幸福水平来说，欧洲是很好得，其全球重要性因此下降，迁徙率也一直提高，甚至比全球平均高。

如果我们比较长长期就业，可以看到东欧国家从1980年代的历史最高点是远远超出全球标准的，劳动力参与率却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远远落后。2010

>>

年代起死回生。所谓两个失落的十年是影响深远的。

> 区域地方因素

这个历史告诉了我们当时社会基础的去镶嵌化。如 Hann 说得，宏观上来说，“市场社会”的方向被打破，这违反了日常生活习惯。匈牙利则出现了大宗移民流入的现象，但政府只接收来自邻近地区的移民；根据联合国数据我们知道2015年有超过2500万的婴儿出生在东欧地方县市，但是不在当地居住同时，另外一方面，移民总数超过1000万，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人口流失。

西方国家因为资本流入和劳动力流出的不平等后果包括了：劳动力与技术的消失，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应的不搭嘎，若我们从国家及社会福利而言，税收会损失，特别是在整个人口老化的脉络中更加如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全球人口增长是事实，可是欧洲人口增长趋于稳定与此相反，人口统计学的角度而言，东欧国家若没有社会福利的紧张，那也没办法运作。这也是为什么东欧人开始非常担心人口置换的问题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商业和资本是一种“移民劳动的虚假交易”。新自由主义中的劳动力人口是被送出母国去用来“进口”的。若是人口结构不稳定，此一议题很容易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温床。然而也很矛盾和可悲的就是说，当新自由主义在历史上历经战争或是为难的时候，这样所代来的恐慌很有用。只是民族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只有全球双重运动也是灵药仙丹，并且拯救世界紧张的局面，所以机械式调整人口结构是万万行不通的。扬弃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出路了，如此一来，全世界的移民和人类才有光明的未来。■

来信寄给 Attila Melegh <melegh@demografia.hu>

允许比较穷的国家的移民的排序
欧洲社会调查(在难民危机之前)



来源：欧洲社会调查 (ESS)，https://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download.html?file=ESS7e02_2&y=2014，2014/15，2019年10月15日使用。

> 迈向民粹之路

Chris Han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德国



Keleti火车站移民，位于匈牙利 Budapest, 2015年. 来源: Chris Hann.

波 兰尼 1944 年 3 月出版的《巨变》是海耶克《迈向奴隶之路》的早一个月。这两者都不算是专业社会学或社会科学著作，而是为了吸引更广大读者群而撰写的书。不过海耶克的书很快就达成销售目标（部分原因是美国杂志《读者文摘》出版了精简版本，可是波兰尼的书那么厚，却也销售得不错。尽管波兰尼和海耶克都受奥地利经济学影响颇深，可是风格和内容大相径庭。波兰尼深入探讨了英国经济史和殖民地，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哈耶克则是艰涩难懂，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核心是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波兰尼认为这导致法西斯主义。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导致极权主义，国家不能干预利伯维尔场。本文不探讨 1944 年的复杂知识史，反而比较这

>>

两者经济哲学与75年后的当今世界的相关性。

〉鑲嵌自由主義的起落

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通常被认为是经济“重鑲嵌”的时代（即是“巨變”的理论）。凯因斯主义的经济管理缓解了波兰人“双重运动”（一方面是市场原理，另一方面是社会“自我保护”）带来的紧张，维持高就业率和福利国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波兰尼并不太管这方面，对北欧福利国家的想法也不怎么喜欢。然而，这的混合经济和Bretton-Woods体系所形成金融体系使自由民主国家得以繁荣发展。

1970年代Bretton-Woods体系的崩溃瓦解，1980年代里根总统和撒切尔总理（尊海耶克为导师）批评相鑲嵌经济，宣扬利伯维尔场。随着苏联碎裂，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中央计划经济不再，私有化和市场化导致了极度混乱。多数后社会主义东欧国家最终加入欧盟，东方的新贵精英与西方的旧精英联手放弃Treaty of Maastricht。欧元创立了，市场主义抬头，资本和劳动力流窜，“社会的欧洲”已经被抛珠脑后。2007年开始的撙节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应突显资本主义的不合理。

〉制度化市場和民粹政治

经济鑲嵌在社会文化和制度中，这不论是你要储蓄、消费，或为了更好的工作迁徙等，还是为了接受Heimat都是如此。去鑲嵌化的比喻很难片面用文字说明：我们要用波兰尼所说的“制度化”才可以理解。利伯维尔场制度其实很依赖国家去捍卫财产权，维护自己的利益。若波兰尼今天提出箴言，他可能会知道跨过大企业可以轻易避税，只对自己的股东负责。并且对世袭政治，像是现任匈牙利的政治操弄（欧盟）就是抛弃了人福祉，发展成一种恩庇侍从主义。

经济新的制度化与“民粹主义”一起影响了全球政治。匈牙利的欧班或美国的川普都怀疑资本主义与民主是否兼容。波兰尼的理论对双重运动的分析在此显现出了一种预言的魔力。匈牙利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有“嵌入式社会主义”，如今却拥抱全球利伯维尔场经济，并防卫自己，价值保守。然而这说明了透过民族主义去掩盖社会的阶级分裂。尽管罗马和犹太人是代罪羔羊，布鲁塞尔（新自由主义欧盟的所在地）已取代了莫斯科（旧的中央计划经济）成为主要的敌人。具体不太一样，但是若看看历史，民粹主义时来自这样的脉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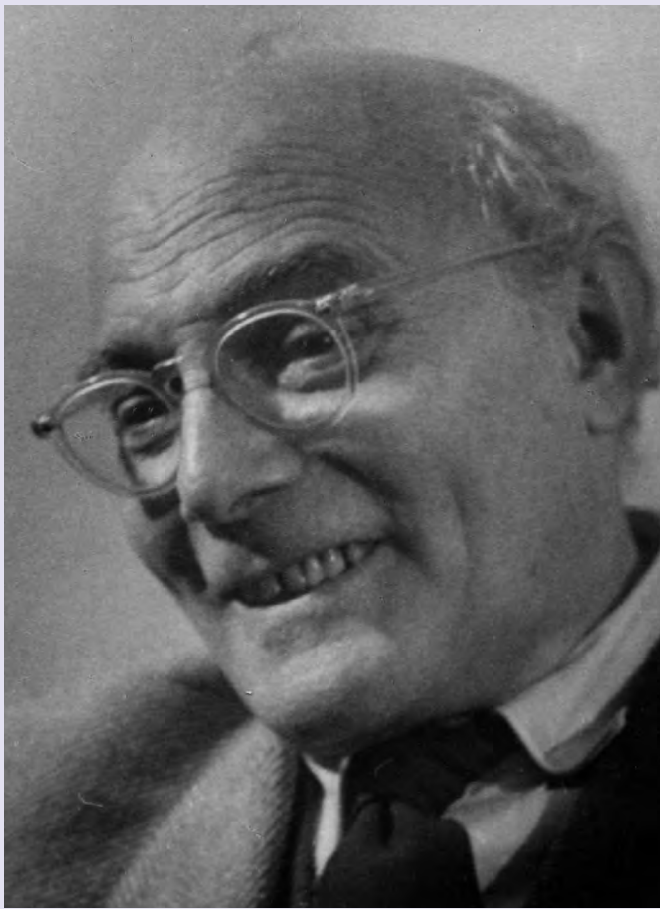
《巨變》是对反社会主义、支持市场基本教义的《迈向奴役之路》一书的很好的分析，

两本书都已被重印多次并被广泛翻译，但是波兰尼没有被收录到《读者文摘》。海耶克的书总是卖得比较好。最重要的是，在冷战结束30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社会主义一直被丑化，我们要扬弃这样的倾向。波兰尼为的最简单观念：利伯维尔场的自发性是个人自由的最佳保障，提供了替代道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凯因斯自由主义来解决海耶克意识形态危机的问题，而我们是否真的迈入资本主义“终结”呢？乐观主义者如波兰尼是肯定的。■

來信寄給 Chris Hann <hann@eth.mpg.de>

> 波兰尼的深远影响

Andreas Novy,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U), 奥地利



波蘭尼於 1964。
來源: Kari Polanyi Levitt.

的分工和利益凌驾于社会和政治价值。

波兰尼也是合作社运动的支持者，其景仰 Robert Owen 的行动，反全球化，倡导社会经济和团结经济，因为这是一种赋权，不论是对于农民，工人，或是个人，乃自社会。这种自我管理 and 参与民主是很好的，行动者具有自主性，以合作取代竞争，“重新融入社会经济之中”，不会有过多对于物质的贪念和欲望，透过这样达到社会经济领域的民主化，经济有自主性，民主理念也不局限于政治。集体决策和课责制并须落实到经济和生产领域。这体现在许多的社会运动之中，从下至上达到社会创新。但是这些人却也常常是受害者，其无法真正超越在地的结构性限制。

> 波蘭尼隱性的空間分析

波兰尼著作中一个面向常常被人们所忽略：隐性的空间分析。波兰尼认为对市场的批判不等于拒绝所有类型的市场。这就是一种对“无所不包的大市场”的批判，“无所不包的大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市场，包括未出售的物品。1930年代“无所不包的大市场”之基础是黄金，黄金让所有社会经济活动可以相互比价，交易。波兰尼认为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是反乌托邦的。他早在二十世纪末发明“全球化”的概年以前就批评“全球资本主义”以及“机器革命”了。

知名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于 1964 年去世，其把经济学看成“必要的生计组成”，并笃信此一看法。在经济学里，Douglas North 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荣获诺贝尔奖。波兰尼则是从 1970 年代开始就是跨学科的社会学家。North 与波兰尼不同，因为其桥调市场，房地产，契约。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 把波兰尼的镶嵌概念推广，研究市场社会中的市场功能，但是波兰尼则怀疑市场社会的存在价值。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缺乏社会凝聚力，因为独立

不过这一切要到2000年网络泡沫化和2008-9年金融危机之后，其所批判的“利伯维尔场经济”才因为所灾难性社会和生态后果让人们同意其说法，也影响了许多人的看法。新自由主义的四十年和生活各个方面的节约导致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增加。社会学者Michael Burawoy应用波兰尼的概念和方法研究自然，知识，数据的商品化。新自由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相当广泛，从性别分工到教育和健康都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兴起也日益深化了这个意识形态

> 新自由主義和對多元替代世界的需求

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化的学术和政治的抵抗让波兰尼成为那些对改变以市场逻辑和霸权感兴趣的人的主要灵感来源了。许多著名学者批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像是Dani Rodrik将其称为超全球化，而Kari Polanyi Levitt称为“金融化”。如Wolfgang Streeck所言，当代全球经济秩序威胁着民主，福利制度，国家主权。替代方案包括了经济一体化，增加国家能力，重塑民主。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最近呼吁新的全球协议，解决此一问题，克服撙节政策的弊端，重新镶嵌到金融市场，限制经济力量，特别是金融资本和数字平台，这是自Granovetter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另类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因为之前者忽略了宏观经济动态。另外，社会学的观点也通过对能动，权力的整合理解丰富了波兰尼对经济的观点，即“必要的生计组成”。因此镶嵌的理解被奠基在地域的理解上，有制度的脉络，制度不会导致统一

的资本主义，而是多元资本主义。

超全球化，就我的理解，是一种替代方法，透由下而上的方式去加强民主。波兰尼强调了超国家的概念，像是地理学家说的，民生经济是由小区，城市，在地社群组成，民主，课责性，社会保障仍主要在国家边界内进行。

最后，波兰尼从根本上来说是其对市场，财产，竞争等制度的批判对后代学者产生了影响与激发批判的灵感。对波兰尼而言，经济进步，社会安全，生存法则的辩证关系式被资本主义市场决定的。从长远来看，随着1930年代自由主义文明的崩溃，经济至上的社会将会瓦解。生态灾难是最好的例子。生物和物理边界转化为社会边界，将掌握资源和被宰制的地方隔离（全球北部与全球南部），不平等严重化，威权主义复辟，保守文化抬头，认同政治的增强，这些也导致了许多保守运动的兴起。照波兰尼所言，个人的自由和责任有着无限可能，无法预测。■

來信寄給 Andreas Novy
<Andreas.Novy@wu.ac.at>

> 纪念 Ann Barden Denis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Saint Mary's University, Angela Mil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rilyn Porter, Memorial University, 加拿大



Ann Barden Denis. 来源: USC 加拿大.

Ann Barden Denis 于 2019 年 2 月 5 日突然过世了，享年 73 岁。Ann 毕生奉献给社会学，跨学科，社会平等，和社会关系。同事，学生，朋友，导师听闻死讯都悲叹惋惜，怀念其人性的关怀，还有合作，研究技能，知识高度，以及可信赖的特质。

最近 Ann 开始使用姓 Barden 纪念她的母亲家庭，其非常珍视外婆和妈妈在加拿大法裔大家庭传承下来的智慧与建议。Ann 从这些女性学习到了教育和工作对于女人要维护自己在男人世界中的独立，是至关重要的。Ann 因为试图了解周遭的人和社会权力的题，进而发展出了其在社会学中的领导能力。这促使她的女性主义的萌芽与茁壮。Ann 对学术和行动的贡献良多，也善与人交往，关怀他人，但仍然是一位独立的女性。

Ann 的过世让许多其支持者顿然手足无

措，她为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会（现在称 CSA）及其女性主义社会学贡献相当多。ISA 及 RC05（当时是种族，民族和少数族群关系，现在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原住民和族群）和 RC32（当时是社会女性，现在是女性，性别和社会）；还有加拿大妇女研究所（CRIA-WICREF）。不论在任何职位，以及在她的双语 Ottawa 大学，Ann 都未曾推辞领导植物（像是会长）和担任次要职位，就是要确保组织，与社会，学术，实践的联系。她也致力于社会正义，开放社会，包容性等基本原则。此外，她编辑了许多书籍，期刊，特集，新闻。也为相关期刊和学术出版提供了建议。其女性主义和领导才能让 CSA 和女性主义小组后来茁壮成长。

Ann 还是 ACSALF（相当于 CSAA 的加拿大法语国立机构），加拿大种族协会（CESA-SCEE）

的会员，并且在曾经是“妇女，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小组 (WGSRF) 的成员，我以在法语国家和英语国家都影响深远，不过她保留了姓“Denis”的法语发音。从月经开始，她坚持用无声字母“s”，后来，她和 Quebec 的同事推广法语和文化。

Ann 于 2011 年在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年会 (CHSS) 上发起了女性主义跨学科会议，从 2013 年起担任加拿大社会学会的女性主义小组长。共同组织许要管理，其接手并亲自把自己的著作译成法语，以法语国家的参与可以双语进行。其影响无远弗届，加拿大社会学会和 CHSS 于是重视双语。

Ann 的社会学知识和女性主义行政取径成为 CRIAW-ICREF 的创立原则。CRIAW-ICREF 成立于 1976 年，目的是使女性从事女性研究。2009 年到 2015 年 Ann 成为董事会成员并担任会长。当时 CRIAW 和其他女权组织摇摇欲坠了，政府裁员的时代中，Ann 帮忙重建 CRIAW 的组织，也重建了志愿委员会。她的 CRIAW 重新获得联合国身份。作为 CRIAW 在联合国的代表，组织者，主持人，导师的身份，在联合国 Ann 的非政府组织女性会议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讨论加拿大问题。

1994 年，在 ISA 大会有个例子：RC32 预会议之后我们的小组到达 ISA 办理登机手续，然后预先定房。但是 ISA 排除了我们之中的一位资深亚洲学者。抗议爆发，Ann 介入后，局势平静，双赢战略于是奏效。隔天早上住房重新来过，让所有人都可以有得住，说服 ISA 允许。这让我们去体会非白人参与者设计的带有门卫设施的“保护房间”。ISA 成员和决策者就像我一样也对种族主义批判至极。Ann 在此关键事件中的行动帮助 ISA 变得更加平等，更加国际化。

Ann 也是一位典范知识分子，著作等身。博士论文《The Changing Role of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1935-1968 年)》发挥了其社会学的想象去处理传记和权力的历史结构脉络。后来研究重心移到加拿大，研究教育，妇女劳动，劳动力，因特网，女性，阶级。种族。有有一次在 1986 年印度举行的 ISA 会议和英语加勒比海地区可见她的杰出表现。带领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研究全球化世界中少数民族的不平等，身份认同，网际网络。

作为 ISA 研究副主席 (2002-06)，Ann 制度化了研究委员会。在再次当选 ISA 后，其合编有《ISA 当代社会学指南：冲突，竞争，合作，与 21 世纪社会学：传统与复兴》。除此之外，Ann 负责 ISA 中的短期和长期社会学研究，以及研究委员会中的复杂议题，例如不民主，语言和地理多元性的缺乏。

Ann 对于加拿大和国际社会学的实践和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女性主义和种族的交织性的方面研究。

她将永远被怀念。■

來信寄給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ruffman@smu.ca>

Angela Miles <angela.miles@utoronto.ca>

Marilyn Porter <mporter2008@gmail.com>

> 迁徙，流动

Karin Scherschel, RheinMa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国



来源：Nick Youngson
(引用3).

迁 移现象来自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全球上的资本分配不平等所导致。若全球没有边界划分清楚的民族国家，那就没有移民问题。国家和超国家决定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秩序，包括公民权和领土。控制移民进入国家边界，特别是控制那些庇护，俨然成为新现象，欧洲和美国边境就是如此，这是两常被提起讨论。

公民身份一方面是现代性的体现，但是也是社会不平等的机制和动力。人们由于不平等于是要迁徙跨越国家，去求学，去工作，或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然而移民自古以来皆然，

自人类有历史后，人们移民未曾听些。Gerda Heck 回顾“想象的欧洲，现实的非洲”一文召唤回来已经遗忘的移民历史。非洲大陆一直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寻求避难，更好生活“避风港”，别忘了这点。

全球今天已成为移民和逃难的动力来源，距离缩短了，移徙人数和国家数量可是史无前例。

移民政策的历史在是发挥很大作用的因素，资本，商品，信息，人力的跨国流动是其一，另外还有国际移徙和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单一主导模式。迁移过程可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因素引起的，像是联合国难民事务研究员就认为气候变迁会导致难民增加，此外土地争夺也是迁徙的原因之

一。

迁移不是单一事件，反之，其应该被看成是多种因素的交错关系。国际移徙不仅仅是人们从一个国家移至另一个国家的过程，还是长期的现象，超越时空界限。Carlos Sandoval “中美洲逃难潮：二十一世纪的出埃及记”一文中记载了这样的现象，因素包括了贫穷，电价不断上涨，天然气和汽油价格飙升，导致发洪都拉斯或萨尔瓦多人的逃难人潮。人们成群结队地迁移并一起跨越国界，不仅可以杜绝绑架或勒索，还有防止暴力，这正式其共同体象征。

全球化让跨界容易，经济流动增加。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造成了移工的巨大需求，移工于移入国经济扮演重要角色。如 Bediz Yılmaz 关于土耳其的文章所言，这些工作通常是非正式的，现有 360 万叙利亚人住在土耳其，剥削叙利亚工人是土耳其政府默许的。Yılmaz 的“不自由劳动的难民：土耳其的经验”总结讨论了不自由劳动的剥削。

国际迁徙是一种跨越时空边界的扩展和展延。多数移民都会有两种生活方式：移出国家的社会，移入国家的社会。移民在民族国家之外开创了一种象征性和集体性的共同体模式。多元是现代移民抗争运动的主轴。移民百百种，有寻求庇护者，有难民，有无照移民，也有专业和劳动移民（包括知识分子，商业精英，家务工作者）。

基于旅行和通讯设施的大幅进步，移民在现代可谓是全球化的现象之一。跨境交流可谓普及化。我在近期访问意大利 Vercana，有缘和在也门长大的一位朋友聊天，当时是 Aden 飞弹攻击的三个礼拜，她回看了家人，写了关于饥荒和杀戮的故事，也纪录了飞弹爆炸，新的传播科技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对不公不义可谓有实时的掌握，对战争和迫害也是如此。媒体让不公不义的现象广为人知，促进改善生活条件，改善移徙，深化民主。

社会学 Zygmunt Bauman 说的好：“财富全球化，苦难在地化。”人们是否有权利和机会移民是被钱，公民身份，性别所制约的。

在全球的层次上发展运动是和反动有所矛盾的。川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围墙是一种激进主义，及欧洲这种作法还受到热烈欢迎，可见一斑。同时，右派的兴起和新型态的侵略性民族主义以及团结主义也展开威胁，人权的全球的扩散招致了保守力量的反扑。Sarah Schilliger 在题为“团结城市的越界”中介绍

了团结城市的概念。城市政治空间是民主活的场域，而公民身份不是地位，而应被视为包括就归属和权利之间的协商动态。

关于移民的思索代表着对于不平等和全球化的批判，也是进一步反思归属感，权利，以及如何行使权利的议题。■

來信寄給 Karin Scherschel
<Karin.Scherschel@hs-rm.de>

> 想象的欧洲和现实的非洲

Gerda Heck,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2018年10月德国总理 Angela Merkel 在柏林举行的非洲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10亿欧元发展基金项目去试图解决非洲的失业问题，因为此问题正导致“大批移民”从非洲出走到欧洲。我们会发现有两个迷思仍然笼罩着此一问题的论述：第一，多数非洲移民是穷人，未受过教育，第二是非洲是移民的宗主国度。很惊讶的是欧洲似乎对于过去殖民非洲的历史有健忘症。然而殖民主义遗绪和与非洲国家的复杂关系，足足大大影响了欧非移民政策和论述结构。

为了揭露被遗忘的过去，我们来回顾欧洲和非洲的殖民历史。过去两百年以来，非洲是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寻求避难以及希望过更好生活的难民和移民的“避风港”。俄罗斯犹太人在十九世纪下半逃离太大屠杀，逃到埃及。希腊和意大利的临时工则在苏伊士运河找工作。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波兰，希腊，南斯拉夫的40,000多名难民逃到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难民营中寻求庇护。也有人去坦尚尼亚，肯亚，乌干达。

> 管控欧洲移民

21世纪初最普遍的政治问题之一是全球移民。为了应付2015年夏天以及秋天的80万难民潮，欧盟于2015年11月设立了“欧盟非洲紧急信托基金”(EUTF for Africa)，专款34亿欧元用来解决

“非正规

移民问题”(欧洲委员会2017年)。欧盟领导人开始与整个非洲国家进行深入的合作，发展援助与各国的政策，提供新的援助，然后换取限制迁移的回报。

大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1980年代以来欧盟采用了多种方式去加强其移民和签证政策。他们根据这些国家难民的发生机率去决定需要签证才能进入申根地区的公民名单。现在某些非洲国家的拒绝率是很高的，像是2014-2017年，德国驻喀麦隆大使馆的签证申请中有45%被发好人卡。

自2000年代初以来边界控管和迁徙一直是欧盟与非洲邻国之间的谈判议题之一。2004年起，利比亚与意大利达成了协议去阻止利比亚来的移民，这导致将抵达意大利 Lampedusa 岛的人会被驱逐回利比亚，被拘留。2008年意大利总理 Silvio Berlusconi 与 Muammar Gaddafi 缔结了“友谊伙伴关系合作协议”。利比亚一直被要求为意大利的殖民赔偿数十亿美元，意大利现在承诺建设和资助利比亚沿海公路，并在20年内每年支付2.5亿美元。2011年随着革命的爆发，北约在利比亚叛乱运动方面的介入，格达费，中止了合作，把迁徙作为对付欧盟的武器之一，而警察部队仍然忠于他，导致了许多人被逃往欧洲。

2012年4月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后，

>>

“ 洲似乎对于过去殖民非洲的历史有健忘症，这有强大的后座力。”

意大利和利比亚同意重新开始一起控制移民。2017年2月2日意大利再次同意和利比亚进行军事合作以控制边界，为的是“阻止非法移民窜入”。意大利政府从此和欧盟向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提供了船，培训，位的是海上巡逻吓阻到欧洲的难民和移民，这让38,000多人被利比亚拘捕和居留。

欧洲和非洲国家之间关于“移民管控，接纳，协商，边境管制，发展，援助，以及签证的保证和承诺”的网络2015年逐渐覆盖了北非，西非和东非。EUTF将重点转向到非洲大陆，因此新论述浮现成形，试图去从根源上解决不受管制的跨境迁徙的问题。EUTF资金中的63%用于发展，22%于移民管理，14%于安全与和平。因此大多数EUTF资金都流向了欧洲国家。像是德国实施EUTF的是GIZ，东非也有“更好的移民管控”的计划，但是该组织因与苏丹前军阀的合作而倍受人权组织的批评。

> 现实非洲

EUTF对非洲大陆的影响尚待研究。不过欧对非洲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作法以确保边界的安全和驱逐移民的方式可以从殖民统治，剥削，种族主义等角度去看。同时这些法规不是铁板一块，非洲政府因此是欧洲政策的牺牲者。从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控制边界无法阻止移民。

实际上Asmita Parshotam (2018)显示非洲是世界上最少迁徙的，多数来

自非洲的移民是非洲内部的移民。2017年非洲有1,940万非洲内部移民以及500万外部移民。喀麦隆，查得，刚果，肯亚，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接纳三分之一的全球难民(490万)。居住在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690万增加到2017年的1,690万，不过这些数字和欧洲媒体报导的大规模难民潮八竿子打不着。

还有，并不是所有些移民都在欧洲居住，像是埃及有80%以上的移民工住在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工作。也越来越多人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海湾国家之间移民。过去的30年来非洲移民也流向广州，香港，杜拜，伊斯坦堡。非洲商人的高度流动密切相关导致了此一移民网络的浮现。不是说欧洲不重要，但是非洲移民的学界论述研究中不用老是把重点放在欧洲。事实上欧洲已经在花很多前去作研究好管理来自非洲的移民，包括欧洲边界和大陆。哲学家Achille Mbembe对此倡议了无国界的非洲，认为为了回应欧洲在非洲境内进行的移民控制，非洲去非殖民的下一步应包括赋予全体人民的移动性，还有重塑政治和文化的公民权。

來信寄給 Gerda Heck <gerda.heck@aucegypt.edu>

> 中美洲逃难潮

21世纪的出埃及记*

Carlos Sandoval,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国际社会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相当关注中美洲人，特别是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逃难潮”队伍首先穿过危地马拉，墨西哥，然后到美墨边界的 Tijuana。

国际社会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相当关注中美洲人，特别是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逃难潮”队伍首先穿过危地马拉，墨西哥，然后到美墨边界的 Tijuana。

> 逃难潮或出埃及？

“逃难潮” (Caravan) 这一用语很值得玩味。西班牙语中和其他语言中的脉络下，“Caravan”并没有逃难的意思。“出埃及”则是个历史词汇，尤其是与圣经有关，在中美洲脉络下则意味着移民的被动与被强迫。中美洲人们不是选择迁移，而是被迫的。此外我要说的是，临洪都拉斯移民是有在增加的。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其实印证了这点。看看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中的中美洲人口就可以比较，发现人数在 10 年中增加了 136%。洪都拉斯移民人口增加了 191%；危地马拉 180%；萨尔瓦多 151%。这里的不是要讲移民人数，因为这已经就知道了，而是做出决定的人数。

> 如何解释洪都拉斯移民

迁徙人数不是什么新的现象，新的是集体

迁徙的这个动作。这种集体行动受时间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该国的电费，天然气费，油价，食品的成本的上涨则是原因。

集体行动少可以减少绑架和勒索的危险。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除外）的人需要签证才能进入墨西哥，于是移民要铤而走险绕过检查哨，这让他们容易受到黑道和白道的勒索取迫害。在社群媒体兴起让许多人都可以连结一起，像是如果搭红眼巴士，路上就可以相互照料。

缺乏就业是可以说是结构性的动机中的决定性因素。其人贫穷人口占 64.3%，这造成了暴力结构，特别是对于那些沉默的大众。

政治上，洪都拉斯政变无疑弱化了社会连结与韧性。2019 年 6 月将是政变十周年，2017 年 11 月，Juan Orlando Hernández 在充满争议，怀疑，欺诈指控的的选举中次当选。Hernández 法修改了宪法，允许连任。有讽刺的是，反对连任是 2009 年政变的动机之一啊。

第三是社会因素。洪都拉斯的暴力案件层出不穷。2016 年 San Pedro Sula 是仅次于

Caracas 的最暴力的城市之一，凶杀率是每 10 万居民有 111 人。

> 路线和目的地

迁徙的大多数人都走了最长的路线到达美墨边境，这项旅途更加险恶，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要避免沿着墨西哥湾，因为那里有许多有组织犯罪，像是敲诈、勒索、死亡。洪都拉斯的 San Pedro Sula 和墨西哥的 Tamaulipas（墨西哥湾沿岸）之间有 2700 公里的距离。然而，大多数移民选择前往墨西哥太平洋一侧的 Tijuana 约有 4,348 公里的距离。

移民当局要求作为所谓“逃难潮”的人在墨西哥当局控制的名单上登记自己的名字。该清单允许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

美国政府仅批准了 10% 的庇护申请总人数，联合国难民事务委员会 (UNHCR) 没有发挥任何领导作用。美国为提供了其 40% 的预算，并且是其最大的金主。

> 接下来

有三点必须要讲。首先是美国 2018 年 11 月 6 日举行中期选举，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四个州中有，八个（总共九个）选取选出了民主党议员。仇外与排外政策没有给川普什么优势。

2018 年 12 月 1 日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就任墨西哥总统。他势必面临多重挑战，非常困难和复杂，其中最棘手的旧是中美洲移民问题。摩洛哥最近在 Marrakech 举行的移民问题峰会上，墨西哥政府就提议为要为每年 20 万通过墨西哥的中美洲人提供就业机会。然而，在 2019 年 6 月 López Obrador 却加强移民管制，好让川普不执行其对墨西哥出口美国的加关税政策。

最后有一点也很重要，除了川普连任和墨西哥新总统和立法的新任期，最大的挑战是要在中美洲保证没有移民的需要。中长期的目标是去解决该国家的不平等问题，这障碍很难跨越，可是统治阶级今天没有意愿这么做，所以毫无疑问的如何改善以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必定为中美洲进步思潮和行动的

试炼。

BBC 曾应在 2018 年 10 月访问了两名洪都拉斯逃往墨西哥的女性，这是不公平和不平等最好印证。其中一位妇女说：“我从来没有得到美国总统任何帮助，所以他有没有帮助宏都拉斯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另一位女性受访者认为，“我们不怕川普的威胁；我们的国家更可怕，所以才远离家园。” ■

來信寄給 Carlos Sandoval <carlos.sandoval@ucr.ac.cr>

* 网站 www.madrimasd.org 是以西班牙语发表的文章。

> 难民是不自由的劳动力

土耳其的说明

Bediz Yılmaz, IMIS-University of Osnabrück, 德国, Maya Association-Mersin, 土耳其



2015年，在土耳其南部Mersin的Adanalıoğlu農村地區周圍玩耍的孩子。來源：A.ÖnerKurt。

有 360 万叙利亚人住在土耳其，也有 60 万其他人住在土耳其。土耳其还是世界上难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对于土耳其政府而言这可是一件值得夸口的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模范。

在篇文章我研究中型城市为个案去探讨土耳其模式的治理特征，我主要是参加了移民相关问题的研究和社运。首先，我想解释难民这个概念。土耳其对于 1951 年《日内瓦公约》的理解是土耳其的叙利亚人是被“临时保护”的，拥有权利，像是无条件享有医疗和教育，但是不保证其身份的永久有效性。因此这样的临时保护政府是任意的、不稳定的、和不安全的，而受限政治动态。我着重在临时保护的特征去彰显一个事实，就是难民虽有福利，但是没有地位可言。

> 临时保护政府的特征

缺乏地位的保障是居住在土耳其叙的利亚人的处境，这解释了难民国家和难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之间的鸿沟。我主要聚焦在难民的劳动力，特别是农业难民。土耳其目前依靠难民去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这点毋庸置疑：土耳其 360 万叙利亚人中虽然有大概一半是劳动人口，可是审查严格，只有 31,000 人获得了工作许可。这导致了难民的工作条件恶劣不稳定。我要强调，非正式工作在土耳其相当普遍了（总占 50%，农业超过 85%），这是土耳其的经济剥削模式。换句话说，若是雇主不承认劳动的正规身份，那么多数叙利亚人将无法活在土耳其。结果是叙利亚人的剥削和以歧视叙已经成为常态。

农业在此一脉络是特殊的，因为其不用获得工作许可，难民也被允许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进一步剥削了难民

>>

劳动力。按照《临时保护外国人工作许可条例》(2016/8375)第5条第4款,在临时保护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工作的外国人不用工作许可也可以工作。按照我在土耳其东部地中海城市 Mersin 的农业区 Adanlıoğlu 的田野,农业的难民劳工象征了不自由劳动的形式。Nicola Phillips 的 2013 年文章有对于不自由劳动的定义,我因此沿用之。

> 难民是不自由的劳动力

首先,“欠债[……]”通常是由于非正式,口头,短期合约导致,对工人的规训,操纵,剥削劳动力。我所观察的农业地区中劳动力中介机构至关重要,因为其要负责帮叙利亚人翻译并解决问题,中介人从可分得每天劳动的 10%。既是谈判者帮工人找工作,找住宿,谈薪水,确保雇主与工人之间任何题。难民的命运被掌控在中介身上。

再者,不自由“主要不是被强迫,而是被禁止的离开;这些条件通常是通过债务或是合约届满前扣留工资。”在这些案例中,若产品要在季节结束收到款项,可能会持续六到七个月。那工人或许可获得一些零用钱,但多数是欠一屁股债。

还有,不自由劳动在当代脉络下不包括无偿劳动,只有交换金钱。但“工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等于在这些条件劳动力所增加的价值。”我发现工资低总是低法定最低工资,甚至无偿,又不能

跳出合约,因为他们通常有“内钱”要能至少部分取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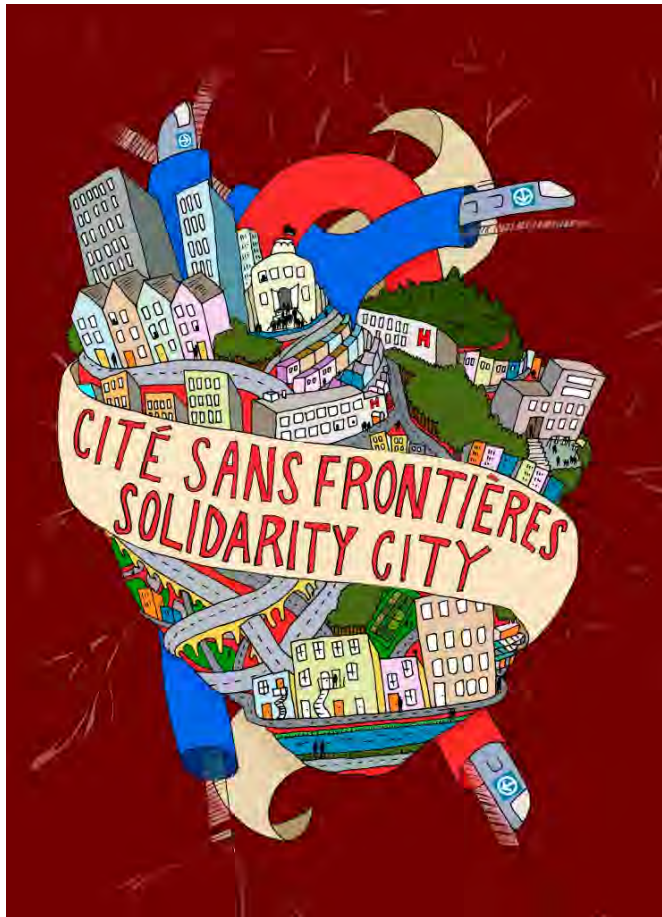
总之自由只有在剥削为前提才成立得以,也就是“和苛刻,侮辱,危险的工作条件有关,工人没有劳动全利,没有人权,被迫工作,让工人自动自发,任劳任怨。的确难民工人租农田地去搭帐篷中过夜(还要付租金),没有基础设施,只好将电线分支去“非法”使用电力,还要付费,这合理吗?农业中介机构根据特定季节决定工作地点,工人总是最后一秒才知道要搬去哪里。

没错,土耳其有大量难民,但是他们并不享有尊严的生活,未来黯淡无光。国内和国际政治的作用下导致了这种常态的运行。这种取径对土耳其人来说不透明,也不永续。如此依赖,土耳其政府如何可能可靠,负责?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模范? ■

來信寄給 Bediz Yılmaz <bedizyilmaz@yahoo.com>

> 團結城市的去边界

Sarah Schilliger, University of Basel, 瑞士



全世界的城市已经成为演变成一个关于移民的政治鬥爭场域，同时城市的权利權也扣连上城市民主化。信用：团结城市。

歐盟國領導人进一步限制移民，此时地中海来的千上萬人的死亡，那些救助遇難難民的人还被定罪，于是有许多歐洲城市宣称自己是“團結城市”。这样一来城市演变成一个关于移民的政治鬥爭场域，城市的权利權也扣连上城市民主化。這些爭取“城市公民身份”的鬥爭意味着城市不僅有可能挑戰民族國家的边界，而且還可以挑戰公民身份的内容。

> 连结海洋和城市

地方上的主要城市都和对于承诺要成为

“庇护城市”有关。意大利沿海城市（例如 Naples, Palermo）和西班牙（Barcelona）的进步派的市长都表示赞成开放其港口给移民，愿意提供救援人员。西西里海岸数百人被淹死事件之后，西西里首都 Palermo 市长 Leoluca Orlando 一马当先宣布成为“庇护城市”。他说：“如果你问 Palermo 多少难民，我不会说有 60000 或 100,000 人。这里没有移民，因为这里全都是我们的市民。“Palermo 宪章”要求将公民权利与居住地结合。

德国的城市愿意为人们提供庇护。像是有数千名公民社会合成的组织（例如“Seebrücke”和“#unteilbar”）支持通过不断地抗议来整取安全举措，呼吁建立安全的逃生路线，并将海上救援定为非刑事罪行，人道地接待难民，像是重新安置。

> 无忧虑没有基礎設施

自 1980 年代以来北美的团结城市运动的历史为欧洲的团结城市运动提供了框架与灵感。庇护城市的重点是纳入城市的非法居民，因为不论是受教育，就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这样日常活动中都有可能被盘查的危險。无证的人会被遗弃，甚至坐牢，逮捕，驱逐出境。

为了保护城市居民免遭驱逐出境，让其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和享有社会权利，人们已经试着结合社会运动与城市政府，包括一起反对国家当局及其移民政策。“不闻不问”政策（在 Toronto 实施）禁止提供公共服务的城市雇员询问移民状况（“不闻”），若知道也不会当爪爬子（“不问”）。某些城市（例如纽约或旧金山），该城市居住的人都拥有市政身份证，该身份证为没有身份的人们提供了更多安全与保障，使其不匮乏于资源。

團結城市運動的積極分子现在以紐約為例去呼吁在多個德語城市（例如，Hamburg, Zurich, Bern）使用城市市民身份

>>



团结跨境移民司法网络的旗帜。信用：跨境团结城市

證。Bern 市政府已經贊成，可是各界仍有爭議，僵持不下。

> 去邊界化

市政府在（內部）邊界制度扮演核心角色，那是因為社會福利的定義有賴於城市政府的介入。限制的不穩定讓移徙者的社會權利成為內部監控的一環，地方為非正式移民提供福利正式在挑戰既有的民族國家界線。

公民概念因而被拓展開來：公民不僅被定義為身份，還是對於權利進行爭取和協商的過程。這種看法不太聚焦在法律定義，而是把重點放在社會關係，社會規範，團結實踐，和歸屬感的協商。因此，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公民身份協商的場域，還有城市社區團結象徵與實踐。

移民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社會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因此移民的論述歷經質變，變成從當前的“在地化”變成不平等和社會參。這這一來城市鬥爭被扣連到不平等，主要是抵抗精英文化和公共空間的商品化，城市基礎設施的所有權，以及參與民主。

> 具體的烏托邦

團結城市的動員論述於是透過相似處召喚了具體的烏托邦。這種具體的烏托邦是把移民與社會政策問題扣連起來，而非對立起來。

此外，“團結城市”的概念使社會住宅，城市基礎建設，文化公民權，民主參與，打擊貧困的鬥爭串連起來。城市空具有需求和現實，從此開始夠過原本通常是分開的各種社會運動的日常鬥爭，進而整合，轉譯了底層人民共同經歷的各種形式的剝削，壓迫，歧視，產生新的認識架構。

這種具體的舉措通常和基層運動為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平台。抗議人士，進步城市，政客，地方政府之間建立連結是重要的。但是城市水平也不准：城市是全球權力結構之一還，民族國家仍然是政治鬥爭的激烈場域。

最後，這個概念也包括重構我們對於所謂歸屬感的社會學理解。這和如何可能成為“他者”是不同的。相反的是，這概念讓我們重新想像“我們”的無限可能。這是對後移民現狀與現實的協商，也是在後移民社會中把移民定調為事實的社會過程。

來信寄給 Sarah Schilliger
<sarah.schilliger@unibas.ch>

> 走向未来的学者： 迈向生态阶级政治

Julia Kaiser, University of Leipzig, 德国, Jasper Stange,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德国



Leipzig大學舉辦了氣候變遷運動大會。來源：Julia Kaiser

世界于一百年后何去何从？最近的研究指出了全球大多数人口会活在暖化的高温环境中，让人类生存至于险境。干旱将影响全球30%以上的陆，过十亿人流离失所。德国物理学家Harald Lesch最近论证说人类将被迫要从灾难记取教训。尽管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谓知易行难。

在世界上每个角落，年轻人将愤怒带到街头去要求改变气候的相关具体作为，他们受到Greta Thunberg每周罢工的激起斗志，漏来变成“未来星期五”全球运动(Fridays For Future)。每周的学校罢工，示威游行，抗议，为的都是制衡政客，要他们遵守《巴黎气候公约》中规定的1.5°C目标。

在德国，抵抗气候变迁的运动很受欢迎，拥有250多个地方分支，也有55%的人支持。若搭配学生的兴趣，也有“未来科学家”和“未来艺术家”之类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扩大其社会支持基础是该运动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若按照此一逻辑，运动规模越大，其对领导者施加的压力就越大。政党派别并不是决定因素，并且每个人都要面临处理气候危机的后果，所以很多人站了出来。这和过去几十年来气候的抵抗运动是很明显有差别的。FFF去走向人群、培力大众，这是可以转变当前社会结构的。

德国学生于2019年初集体加入FFF，组成未来学生团体(Students For Future)。本文

认为SFF通过确立一种系统性，基于阶级的动员组织能够对气候运动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在此简要总结SFF的简短历史，然后分析其特色。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用意是检视世界各地的学生和社会科学家如何支持这场运动，好商讨应对之计。

> FFF 征服了大学

随着“星期五未来”的迅速增长，2019年春季于德国各地的学生运动者就开始讨论如何搭上这股风潮，加入抵抗气候变迁运动。一开始的目标就是“立即行动！”，这口号喊的响亮，组织许多学生。活动顺利进入大学校园：气候正义的实现于是成为显学。在短短几个月内这些政治工作者和学生团体在全国20所大学中组织了会员大会，者可是大学多年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集会。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成功如何可能的？

德国东部城市Leipzig使用的方法已被许多其他城市效法，因此我们将以此为代表性。为了吸引学生，Leipzig的运动者用了工会组织的概念。目的是使其他学生参与，并推广其诉求，加入决定是否支持该大会，于是流传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对FFF的声援，并要求大会讨论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大学和城市的步骤。运动者和支持者有系统地在所有院系和主校园中传播请愿书，并经常在老师的支持下引进这一请愿书。你不会相信，这短短一周内就有

2500 名学生签名。

大会上的大学和工会的发言人强调生态与社会政治的相互合作之后，学生于是就是有机的成员了。在柏林等其他城市，不仅针对大学，而且针对工会。工会受邀参加“气候大罢工”并敦促柏林参议院做出具体行动，建立更好的公共运输系统。

> 全国的交流与推广

承袭了在 Leipzig 和柏林等城市所采用的方法，2019年6月其组织了全国 SFF 运动聚会，来自 30 多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提出动员大学生的方法。美国工会组织者和作家 Jane McAlevey 受邀教给运动者一些组织的小撇步，然后放眼未来。此次聚会是学生运动合作的第一大步。夏季学期末，这些运动者在 14 个城市组织了会员大会

同一时间学生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与 FFF 发起的工会的对话。德国截至目前为止几乎每个主要工会都在有和 SFF 和 FFF 运动者接触。这过去的几年中工会和社会运动的种合作是很罕见的。工会像是代表公共交通工作者的工会，其利益的交互重迭似乎是抵抗气候变迁运动的自然盟友。像是 FFF 和其他运动者对话之后，ver.di 服务工作者工会负责人 Frank Bsirske 公开鼓励 ver.di 成员参加 2019 年 9 月 20 日的全球罢工日。最重要的是即使 IG Metall 这样的工会代表碳排放密集产业，受到冲击的影响最大，也和 FFF 交流了，气候变迁抵抗运动要去解决许多问题，也要与工会实际合作，因为这些合作可带来大规模的结构变迁，壮大运动，带来真正的生态与社会永续发展。

> 新的抵抗气候变迁运动？

面向未来的学生一路走来有迹可循，可以归纳出一些特征，合在一起看，其实会发现，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但至少也是相当鹤立鸡群。

第一，SFF 的目标在于纳入更多人近来斗争，这和要求参与者接受重大自然和法律风险的其他行动形式有所不动，例如占领地雷或占领森林运动。激烈运动形式会自然引来激烈的运动者，也就是 Jane McAlevey 所说的“自我筛选的运动者”。反之，《未来的星期五》是透括纳入更广大社会运动而去进行组织的。

多数决也对这个运动的运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大学内部 SFF 主要是招揽学生去解决气候危机的问题，而不是局限于那些本来就参加社会运动包括气候运动的人口。于是有许多的年轻人投身政治，让该运动的组织和规模迅速

发展起来，那些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的人也可以面对群众侃侃而谈，组织示威活动，冲撞前线。有趣还包括了这一事实：这些积极参与者的大多数是年轻女性。

再者，运动的社会基础从外部扩展到学校和大学之外时，SFF（以及部分 FFF）至少也实践中分享“多数”特定于阶级的概念。政党，企业，银行让 FFF 有了名声，获得对运动的更多支持，欧盟等也被其赋予气候变迁政策的期待。许多 SFF 运动家扮演重要角色，社会运动有工作团队，专门与工会建立了对话管道，并动员受薪阶级。团结之外，实际发挥的经济议价能力的的确带来了社会变迁。其对工会的态度不仅是由于对有组织的工人的经济实力的认可，也是克服的全球气候抵抗运动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传统碳排放高的产业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右派很会发展这种观点，对那些直接受到经济整影响的人中特别有效，例如在德国东部前采矿区 Lausitz 就很令人惊讶。虽然基本问题未或解决，但是 SFF 运动家和工会之间对话显示了全球气候的利益与公交车司机，钢铁工人的利益是站在一起的。

> 展望未来

面向未来的学生，其战略有二，一是使多数民众积极参与气候运动，二是进行组织战，最终目的是进行结构改革，透过公众参与去开创永续社会。像是德国将要举行的全国公共交通部门集体谈判，这可以带来机会给气候社运者，工会，小区在地组织。卫生和教育部门也是类似，公共交通不仅对气候变迁很重要，对于整个城市和地区的社会再造和福利也很重要。以此向上，SFF 可以联合小区和大学团体，团结起来，并相互支持，例如罢工。FFF/SFF 等社会运动的外部政治压力也会影响谈判，意义深远。工会若和气候变迁抵抗运动合作，可以为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带来工资提升，通过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扩展和使用改善人民感受，减少碳排放。

社会运动家的“星期五未来”的发起运动中很有影响力，让政党，企业，国家气候变迁危机的解除充满了信心。不过虽然德国绿党内迅速散播开来，致使气候变迁议题成为公共辩论达数月之久，可是并没有带来德国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工会与气候变迁抵抗运动合纵连横，想样达到生态和社会转型，或许这会杀出一条血路吧。

> 加入我们！

我们认为大学可以在抵抗全球气候变迁运动中扮演至观重要的角色。如此一来学生组成的团体和积极动员过程可说很重要，因为解气

>>

候危机的成因和可能解决方案做还需要学者的一起努力，技术不是决定一切，所以技术不能抵抗气候变迁，而是要经济和社会进行改造工程，社会科学家因此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要确切呼吁：学生们，起来！起来抵抗气候变迁！科学家们，起来！起来把研究和务实结合，并且开放你的研究成果！最后，与我们一起起来反抗气候变迁。这些放眼未来学生热情地讨论气候罢工的可能。为期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组织起来关于气候危机及其解决之道的会议。德国校长大会 (HRK) 将大学的角色定义为“民主文化的中心，领导社会的进步与前进。”现在气候极具变迁中，那此时此刻也正式开创未来的最佳时机。■

來信寄給 Julia Kaiser <julaidakaiser@gmail.com>

Jasper Stange <jasper.stange@hotmail.de>

> 塞内加尔的民办天主教教育

Moustapha Tamba, University Cheikh Anta Diop of Dakar,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的天主教教育在今天仍是主流，因为殖民政府在1816年给教会有开学校的权力，其中像是 Saint Joseph of Cluny 姐妹，Ploërmel 弟兄，圣灵的传教士，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Castres 修女，和圣母 Mary 的女儿。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就是20世纪后半叶，1946年到1960年之间，牧师 Marcel Lefebvre 和 Vicar Apostolic 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另外，Saint Gabriel 弟兄，Sacred Heart 弟兄，Ursuline 姐妹，Saint Charles of Angers 姐妹，Marists 等，也很重要。

教会于1970年将教育责任给了天主教教育国家局，这是塞内加尔1960年独立后开始的。国家机构在1976年建立了，现在是国家秘书处。私立天主教教育从2003年以来已成为“塞内加尔天主教国

家教育部”的一员。

私人天主教教育的权力却透过教区理事会而分权。在七个教区中，每个教区都有其“天主教教区长”(Direction diocésaine de l'enseignement catholique) 或称之为 Didec。教区主任管辖其教区中的所有天主教学校。

我们和负责天主教私立教育的机构进行合作，进行研究。我们特别是和 Archdiocese of Dakar 和塞内加尔天主教教育国家办公室秘书合作收集资料。位于 S. I. C. A. P. 的 Baobab 在圣彼得教堂对面，这对于数据来说很方便。

我们以表格分类排序去显示我们的数据。

表格1中我们可以看到 Archdiocese of Dakar 占学校总数快要50%了，成员有第一个包括 Le Plateau, Grand Dakar-Yoff, 和 Les

Niayes, 第二个包括 Sine 和 Petite-Côte。41个教区组成了天主教学区。Thiès 和 Ziguinchor 的教区分别占16%和11%。Kolda 和 Tambacounda 的教区机构则不多。

达喀尔大主教管区名列前茅，占学生总数的57%。根据 Didec 的统计，城市地区，特别是达喀尔及其郊区，共有25,360名学生接受基础教育，而农村地区 (Petite-Côte 和 Sine) 则有10,944名学生。在中等教育水平上，大主教管区在2018-19年度的城市和农村地区也分别保持14002名和2465名学生的排名。在中学教育中，大主教管区仍位居第一，占私立学校总学生人数的75%。圣心堂仍然是最大的私立天主教学校，在2018-19年度共有1,059名学生入学。

Dakar Archdiocese 则宣称穆斯林学生比天主教信仰的

表1：2018-19年度天主教学校的学区分佈

教區	等級					總數	%
	幼兒園	小學	中學	大學			
Dakar	58	54	23	14	149	48.5%	
Thiès	22	24	3	1	50	16%	
Kaolack	12	13	2	1	28	9%	
Ziguinchor	11	15	8	1	35	11%	
Saint-Louis	8	6	3	1	18	6%	
Kolda	6	6	3	1	16	5%	
Tambacounda	4	5	1	1	11	4.5%	
總和	121	123	43	20	307	100%	

来源：塞内加尔天主教国家教育办公室，2019年3月。

>>

表2：2018-19年度不同教育等級的私立天主教學校學生分布

教區	等級					
	幼兒園	小學	中學	大學	總數	%
Dakar	6,442	36,304	16,467	6,696	65,909	57%
Ziguinchor	2,268	5,735	1,856	491	10,350	9%
Thiès	1,983	11,080	2,665	836	16,564	14%
Kaolack	1,441	5,326	733	248	7,748	7%
Saint-Louis	970	3,519	1,212	262	5,963	5%
Kolda	656	3,465	958	245	5,324	4.5%
Tambacounda	417	2,630	479	143	3,669	3.5%
總數	14,177	68,059	24,370	8,921	115,527	100%

來源：塞內加爾天主教國家教育辦公室，2019年3月。

學生還多。像是中學在 2018 到 2019 年中有 72% 穆斯林，26% 天主教，2% 其他。塞內加爾人民由此可知是包容不同宗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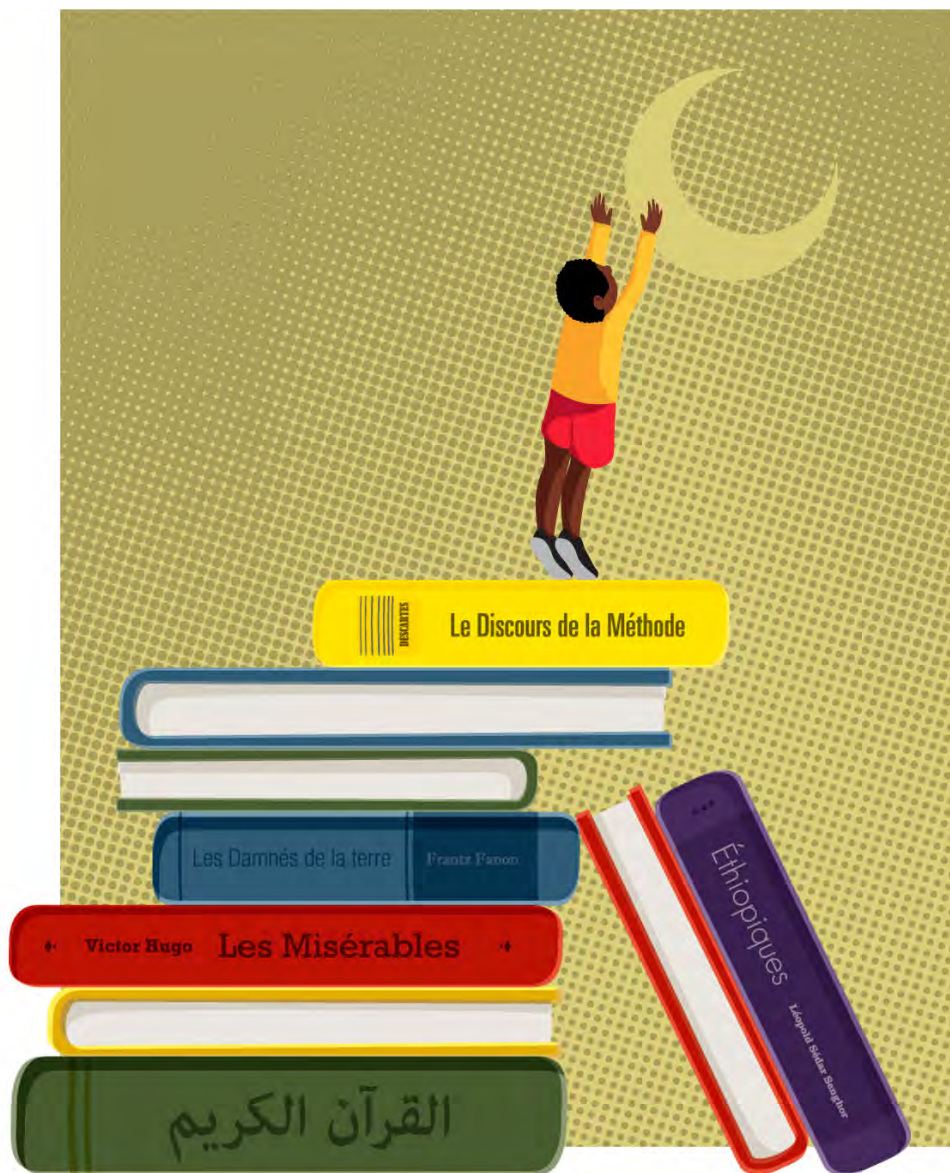
言而總之，天主教教育相對世俗教育一直是領頭羊。像是 Saint Louis, Gorée, Dakar, Rufisque 等 19 世紀就有學校。然而多數學生在 Archdiocese of Dakar, 包括 Dakar, Petite-Côte, Sine 等，可是現在已經是全國性的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教育機構的數學生多數是

穆斯林，而非天主教徒。■

來信寄給 Moustapha Tamba
<moustapha.tamba@ucad.edu.sn>

> 塞内加尔教育系统的社会学考察

Souleymane Gomis, University Cheikh Anta Diop of Dakar, 塞内加尔



Arbu繪圖

进行对于塞内加尔的教育制度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将会是一个很好机会全面盘点的机会。从殖民时代起，赛国的教育体系有各种结构上和功能功能上的优缺点，我们必须继往开来。值得注意的是，塞国是少数几个历史很长的非洲国家。早在与欧洲接触之前塞国已经黑海伊斯

兰化时期曾经接触过可兰经教育。

几个历史和宗教人物像是 El-Hadji Malick Sy, Sheikh Ahmadou Bamba 和 Sheikh Ibra Niass 让可兰经教育在塞内加尔及其他地区内扩散。也因为如此，阿拉伯语教育的帮助了抵抗法国的入侵。可是法国殖民者知道如何利用塞国的阿拉伯语教育来建立殖民教育制度。塞内加尔在 1960 年独立之后仍然保留了法语教育制度，这个从殖民者身上学来的东西后来成为后殖民民族国家建造的资源，这表现在法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可以清楚看到。

不过人们仍然辩论是否塞内加尔人的教育体系有其自主性，塞内加尔人仍有高度的主体意识。学校双语教育就是显然的一例。

> 赛国教育系统的诞生

第一所非洲的法语学校是于 1817 年在塞内加尔的 Saint Louis 创建的，由 Jean Dard 建立，他是 27 岁的法国教师。从此以后赛国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在沿海城镇和城市蔓延开来，括及到内陆。殖民主义带来了学校的发展，商业，以及政治上的交流。

和大多数非洲前殖民地一样的是塞内加尔的教育纲领历经了法国化，这到了 1960 年独立后的 1970 年代才开始本土化，1990 年成为民族国家不可或缺得一部分。可是历经已十年来，塞内加尔的教育体

>>

系在结构上和 在功能上效法法国殖民者体制，也就是 6 至 16 岁的青年享有免费义务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订定了每个国家 2% 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塞内加尔目前的人口估计为 1500 万，那么应该会有 30 万名高教生。可是实际人数只有 15 万，还有，其实其教育纲领和人民的期待有所落差。

〉 优缺点

塞内加尔公立学校制度是成功的典范，在科学，医学，法律，文学，经济中皆然。例如文学界的 Léopold Sédar Senghor，历史和物理学界的 Cheikh Anta Diop。这些人的作品都是历史的宝藏。教师的培训质量则是赛国的另一向长处，其决心和毅力必须被肯定。父母参与和投资是另外一个优点，父母会准备学费让小孩上学。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国家，教师，工会，技术和财务没有把父母参与学校课程的发展这点纳入考虑。这样一来，人口减少，少子化，学生减少。

塞内加尔的教育系统不论在政治，心理，下层建筑，计

划，物质，财务，和个体的层次上都绑手绑脚像是教育政策的制度和就没有完全自主：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金钱限制。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认识到塞内加尔教育有强制性、但尚未充分融入国民的思维模式，塞内加尔人仍然认为不能自主办学，因为学校是从法国殖民主义的延伸而已，。

在纲领层次上教育的内容与法语课程雏型息息相关，尽管有些变化性，但是新课程并未真正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现实，不过是再生产了殖民主义的惯习。

物质层面上，资源匮乏是塞内加尔教育之度的致命伤。小学到高等教育都是如此。

尽管困难重重，塞内加尔的教育制度仍然是不错的。■

來信寄給 Souleymane Gomis
<Souleymane.gomis@ucad.edu.sn>

> 塞內加爾法語阿拉伯學校的策略轉型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Cheikh Anta Diop University of Dakar, 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的小學教育著重於阿拉伯語和法語的識字率。圖片提供：全球教育/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塞內加爾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家庭說阿拉伯語了，這是由於伊斯蘭教傳入的緣故。該國人口有中95%是穆斯林。受到高度重視的阿拉伯語是該國的特色，這也是可蘭經的語言。對可蘭經熟稔的人通常被看成是高教育程度的穆斯林，只是殖民者並不重視，創建了法語教學的教育體系。

兩種教育制度其實水火不容。只是說為了要滿足人民，法語和阿拉伯的私立和公立學校都提供法語和阿拉伯語雙軌教育。塞內加爾人民是離不開伊斯蘭的，這是跨區域且跨種族的現狀，深深影響了人們

本文以文獻回顧方法去解釋為什麼塞內加爾人民可以善加利用法語阿拉伯學校的教育

去反抗殖民者。

> 法語阿拉伯學校的學習模式

我們發現有兩類法語阿拉伯學校：以伊斯蘭課程（可蘭，fiqh, Sunnah 等）為主的，以及以法語與阿拉伯伊斯蘭教育之間的雙軌為主的學校。法語阿拉伯學校如今已有大筆資源投資在學前教育和基礎教育上面了。

首先，第一類法語阿拉伯學校中，前兩年的小學教育著重再阿拉伯語和可蘭經。法語班僅限於介紹字母和對話方式。學生的責任就是尽可能記住很多的可蘭經文。第三年開始學生就要“追趕上”第一，第二，第三年的基礎課程。小學第六年中，學生要參加法語和阿拉伯語考試，獲取兩種語

>>

言的基本畢業資格（阿拉伯伊斯蘭課程畢業證書）。

再來，第二類法語阿拉伯學校是一種雙軌教育。Al Falaq 和 Jamaatou Ibadou Rahmane (JIR) 運動對於法語阿拉伯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之前該地是被遺忘的地方，而該地選擇法語作為官方語言。

阿拉伯－伊斯蘭教育與世俗公共教育的差異是在於前者主要是去創建和培訓具有深厚根基（伊斯蘭）宗教信仰的未來公民，而且可以在公立學校提供協助。像是 JIR 運動創立的 Bilal Koranic 學校就是這樣的方式辦學。除此之外，JIR 還創建了中學讓該學校原本是要接受 Bilal 學校的畢業生可以在不知道父母意願的情況下上學。在 JIR 的學校中，每個班級的都有兩名老師負責每一門課，法語老師和阿拉伯語老師這占半邊天。JIR 還為許多機構提供教師培訓課程。El Hadji Omar Tall 學校中的阿拉伯－伊斯蘭課程幾乎可以取代世俗公共教育。雖然有些父母贊成阿拉伯－伊斯蘭教育，但是這也是一種階層化的排擠效應。像是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更名為 FASTE）為阿拉伯語的畢業生提供培訓，所以阿拉伯語教師是和其他老師同地位的，薪水都相同 (Thierno Ka, Alioune Diop 和 Djim Dramé, 2013)。

> 法語阿拉伯學校：雙語認同
有受過阿拉伯語良好教育

的人人是自認的“反精英”，他們對文化公民權（新形式的公民權）有不同的詮釋，此一觀點被會講法語的穆斯林深受支持 (Camara, 2016)。雙重身份賦予了“二等公民身份”的免疫方式，強調是國家公民一員。其主張批判對國家及其世俗制度，但也沒有辦法超越現有制度。但是這穆斯林人口在訴求其公民權和政治權的背後是因為這些人口想促進其“伊斯蘭社會”計劃，挑戰自獨立以來統治塞內加爾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的霸權精英的

> 結論

法語阿拉伯學校現在已經根植在塞內加爾了，特別是在城市中心。被稱為“阿拉伯人” (arabisants) 的阿拉伯伊斯蘭學校的畢業生長期以來就業情況就不好。法語阿拉伯學校在全國考試 (BFEM, 學士學位) 中的成績領先群雄，創造人才，這將是該國的寶貴資產。大多數在塞內加爾伊斯蘭運動中的這些精英可以用語阿拉伯學校作為認同的手段，翻轉西方的認識論。■

來信寄給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asmalick20031@gmail.com>

注 1：該學校的畢業生現在是高級公務員，有些則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老師。

注 2：Faculté d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Formation.

> 塞內加爾的世俗私人教育

Samba Diouf, Cheikh Anta Diop University of Dakar, 塞內加爾



私立学校在塞内加尔受到家长的欢迎，因为没有罢工或教师缺乏的问题，这种安定环境让家长放心许多。图片来源：Alan Levine / flickr。保留部分权利。

傳統文化和殖民歷史鑲嵌在全球南方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因為教育制度不可能有橫向的移植，歐洲到非洲的影響是混合在地化的。其中的行動者也都有自己的執行策略。這種跨越海洋的教育轉譯是會和當初的理念背道而馳，但是本土化本身就是一種融入和協商的過程 (Charlier, 2002)。殖民者帶來的教育也不是不能被挑戰，“西方”，“法國”，“正式”或“現代”等的形容詞有象徵意義，但是經過本土之後都可以有所變革。傳統教育一直在現代制度中有身影，像是塞內加爾可蘭經學校就一直趕上社會腳步而立足。國立學校則是對傳統教育有所補強，引進了現代化的制度原則。¹

塞內加爾的解殖民歷史指向了它所預想的一種培育人才的內容和形式。1963年《憲法》規定：“共和國是世俗的，民主的，和社會的。[...] 有教無類 [...]。學校應該提供教育，宗教和社區也可以參與。私立學校被須被國家規範，[...] 但是宗教機構和社區不在此一範圍。”塞內加爾世俗共和國因此承認“作為教育手段”的宗教和社區是享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教育控管並不適用於宗教制度。然後1996年，政策往下紮根，教育責任落實到市政和農村社區和後來的州層級。2001年《憲法》明確規定了每個機構的作

>>

用。國家“有義務提供公共教育，兒童有上學權利。[...] 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教育機構都有責任教育學童，解決文盲的問題，提昇語言識字的能力。”國家的責任再次被確定，且州的地位也增強。

> 世俗私校

1980年代，塞內加爾開始有了世俗化的私立學校。個人發起人的世俗的私立學校主要由法起人去管理行政，財務，教育。這和天主教私立學校不同，因為雖然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都是國家教育部的管轄範圍，但是私校不受教會控制。

世俗私立學校自2000年代以來相當受到許多人們的歡迎。其學生的需求量大，不多也面臨一些實際問題，像是教師的薪水發不出去，薪水過低，房租過期等，所以有些學校只好被迫關門。

> 父母對世俗私立教育的看法

私立教育在Dakar之所以那麼受歡迎的事實可以從私校擴張和學生註冊人數大增的事實中看到。受訪的父母多數指出他們會讓子女去就讀私校的原因是因為安定的環境。這可以在缺工會運動組織的罷工情況中得到印證。另外，還有位受訪者指出：“暴力行為和青少年犯罪案件於公立學校層出不窮，所以導致許多父母寧願

選擇私立學校。”像是一位38歲的家庭主婦認為：“公立學校的學生若表現不好是因為不用工。但是在私立學校沒有罷工或缺乏師資的問題，並且資源充足，家長貢獻很多。”由此可知家長非常重視私立學校的穩定性，教育品質反而其次。這讓家長都認為私校的小孩一定將來會非常有前途。

世俗私立教育的公眾認知告訴了我們一件事：那就是，選擇私立學校的多數父母為是為了尋求安定的教育環境。這些私立學校很有名，是因為其學生的學業成績有目共睹，不過安定的環境還是父母守選。

來信寄給 Samba Diouf

<bathie78@yahoo.fr>

注1：見 Suzie Guth and Éric Lanoue (eds.), (2004). *Écoles publiques, Écoles privées au “Sud” : usages pluriels, frontières incertaines*, Cahiers de la recherche sur l'éducation et les savoirs, 3.

> 塞內加爾宗教領導的社會人類學考察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Cheikh Anta Diop University of Dakar, 塞內加爾



在塞內加爾達喀爾的清真寺。圖片提供：Valentina Buj / 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 宗教領導的遺產

塞內加爾從最早的時候就是歐洲、非洲和美洲之間交流的軸心，塞內加爾人民的開放程度就是這樣的历史產物，其熱情、好客，穆斯林和基督教相互包容。其社會文化價值根源於：傳統文化，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西方共和與現代性。其中伊斯蘭教的影響最為巨大，95%的塞內加爾人是穆斯林，大多數屬於正式團體：Tijanyya 兄弟會佔49%，Mouride 佔35%，Qadiriyya 兄弟會佔7%，以及Layenne 佔5%。

政治宗教歷史在塞內加爾留下深刻影響，其中伊斯蘭教孕育了維持社會和諧的知識

分子和領袖。這些宗教領袖對塞內加爾及其人民影響巨大。例如在Futa-Toro的El Hadj Omar Tall，革命領袖Samori Toure，Maba Diakhou Bâ和Thierno Souleymane Baal，其在Futa-Toro的Torobe革命反對Songhai Koly Tenguela帝國，這是塞內加爾人無可抹滅的集體記憶。這樣的領袖融合了伊斯蘭與非洲民主的“舊”傳統，基礎是對權力的批判，對全知全能想法的懷疑與阻止。傳統的非洲社會意識到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因此時常要領袖人挺止“扮演領袖”，並避免絕對權力的腐敗。

在Wolof社會中國王就職

>>

典禮上，酋長通常發誓要按照傳統行事並為社會繁榮盡心盡力。像是在 Waalo 帝國的著名人士的發言會警告當選的國王：“若你背棄人民，你會被人民唾棄。如果你和糧食作對，選民的之間會激起仇恨。”這種不信任可以在 Wolof 諺語中找到，這也讓國王回想起他對人民的職責：

“Buur du mbokk”或比喻為“國王不是人民的父母”。在伊斯蘭教義中我們會看到，從信仰的那一刻開始，人們就不再依賴他人。伊斯蘭教因此沒有神職人員，人們自己的領導，並尊崇傳統價值的伊斯蘭原則。Futa 的 18 世紀軍閥和穆斯林學者 Thierno Souleymane Baal 了解塞內加爾的宗教或公民運動可以如何展開：

“你被建議去遵行以下規則：

- 選擇一個明智，虔誠，誠實的人，他不會為了自己的家庭而貪腐；
- 推翻那些貪腐的伊瑪；
- 確保伊瑪不會世襲；
- 如果其堅持的話，推翻之；
- 民選伊瑪；
- 不要只選同一個部落的人；
- 選賢與能。”

> 價值觀之于領導的重要

宗教領袖必須正義，無私，誠信，利他。忠於信念，信守承諾，恪守道德。歷史上的兩位宗教領袖就是很好得范例：Serigne Abdou Aziz Sy Dabakh 是 Tidjane 兄弟會第三任領導（1957-1997 年），和 Serigne Saliou Mbacké 是第五任。前者告誡到：“如果你看到我背信望義，一定要

指出來，否則我將永遠不會原諒你的怠惰，若必要，你要和我切割。”

在建立共同的願景和道德標準以外，領導者的權力還取決於以律己的能力。領導者必須尊重“nit ku baax”（好人）的道德價值觀，這意味著“nit ku am jom”（榮譽感），“nit ku am Kersa”（專業），“nit ku jub”（正義），“nit ku amdiné”（信徒），“nit ku doylu”（理性），“nit ku am kadu”（男子的承諾）和“nit kugoré”（有價值的人）。在這些價值觀中，“愉悅”很重要，因為它涵蓋了各種含義：責任，榮譽、尊嚴，努力，犧牲，勇氣，自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價值。Wolof 人會認為領導者必須背棄“懶惰”，唾棄謊言和不一致的價值觀。

塞內加爾人厭恨背棄承諾的領導。前總統 Abdoulaye Wade 說“Wakh wakheet”（“我收回我說過的話”），因為其說過不會選第三任，但食言了。現任總統 Macky Sall 也背棄了曾經說過要將任期從七年縮短為五年的承諾，一樣是“Wakh wakheet”。諺語“gor sa waxja”（貴族是尊重說過的話的人）反映了塞內加爾人對信守承諾的重視是如何的嚴肅以對。■

來信寄給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mouhamed.dieye@gmail.com>

> 让女性权利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engi Sullu, The Graduate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美国 1



第六十三届女性地位委员会会议开幕会议。图片来源：联合国女性署/ flickr。保留部分权利。

第六十三届的女性地位委员会会议 (CSW63) 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22 日在联合国的纽约总部举行，主题为“社会保护，公共服务，永续发展，性别平等，女性儿童赋权”。地方，国家，全球等面向都是讨论永续发展的关键角度，透过不同事件的讨论去改进和保护女性和儿童，落实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的权利。尽管人们对于女性地位的提升越来越有共识，但是对于女性保护和福利的落实仍然至关重要。

该委员会主席身兼爱尔兰的联合国

>>



第六十三届女性地位委员会会议全体会议。图片来源：Africa Renewal / flickr。保留部分权利

大使 Geraldine Byrne Nason，其当天的演讲——具有联合国咨商资格的非政府组织大会上——强调承认女性权利，性别经济不平等，教育机会取得等议题，希望前方道路越来越光明。若要达到性别平等，在承认女性权利和政策落实中要达到平衡，并且要创新，有系统的，永续，文化等，更要关注女性的政治代表性，以及在公共领域中的教育，经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联，奠基于女性的经验，观点，立场，知识，做法，以及政策制定，更要体认到种族，阶级，民族，宗教，地理，职业等 P.H. Collins 所谓的“交织的结构性压迫”镶嵌在社会中导致更种型态的性别歧视。

对于协调政策和为了解决最性别不平等的需要可从以下几点来切入，对于女性的家暴，公共场所和教育环境中的安全，经济场域的排除，政治机会的剥夺，以及无常照顾工作，家务分工的不平等。这些议题在 ISA (CSW63) 大会中是讨论的核心，围绕在政策制度相互关联上，例如教育，儿童，刑事，就业，及居住，交通等，帮助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场域的女性参与提升，也强调创新和务实的兼顾。

像是女性遭到家暴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私领域范围，往往被看作是家务事，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包括就业机会取得，生活独立，居住安全，可负担的托育，咨询等，但还有更多。

家暴是侵犯女性权利的一种形式，法律无法自动包护女性，还要有效的执法。

另一个问题是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安全。Jackie Sebire 博士在“让女性可以仰赖司法保护：女性执法的作用”场次中说，照其担任英国警察局助理首席警长的经验来说，女性是可以仰赖司法保护的，因为女性问题的敏锐度可以提升，倡导女性参与警务更可以培力女性，打破既有的父权结构，所以“女性主义观点的知识”适度亢性别暴力的主要武器，但长久以来并没有被重视和承认。年轻女性的入学人口增加，让这议题更加明显。Natarajan et al. (2017) 指出女大学生常常遭到性侵害。所以这样的看法研究可以帮助制定更好的政策，导入必要的科技和公共服务去促进女性的生活和职场安全。

女性被排除在经济市场之外的因素不仅是受到暴力的困扰，女性担的无偿照顾和家务劳动限制其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限制了工作的机会。研究指出“在世界上，女性无偿照顾工作的劳动力参与在时间上是男性的两倍，甚至到十倍。”(Ferrant et al., 2014)。照顾工作很明显尚未被政府视为维持经济和生命的组成，女性也没有带薪产假和育儿假，缺乏社会保障，没有福利，这项女性在生育时面临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难题。如果这些女性想返回职场，大多机会不多或是被降职。“女性重返职场和社会保护”场次讨论这种结构性歧视特别影响到有前科的女性，其资料让她们很难重返劳动力市场。家庭中心的权利保护政策因此至观重大，因为他们

>>

强调在男女家务分工的平等。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和利益的增进要有更全面的作法，这是保障法律上的有效性。不同国家的政府必须积极确保女性可以达到上述目的的机制和方法，去保护和培力女性，非政府的组织像是国际社会学会就扮演这样的角色，教育政策制定者，以便制定更有利于女性的政策。■

來信寄給 Bengi Sullu <bsullu@gradcenter.cuny.edu>

注1：作者为ISA 联合国青年代表，于2019年首次参加了第六十三届女性地位委员会会议。

注2：小组由国际社会学会，美国犯罪学学会，国际被害人学会，无国界犯罪学家所共同发起。可以听到ISA 联合国代表 [Rosemary Barberet](#) 博士在联合国上讨论CSW63，有六个场次的影片，照片，書單。这些都是由ISA 和联合国共同发展的。

參考文獻：

Ferrant, G., L.M. Pesando and K. Nowacka (2014). “Unpaid care work: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analysis of gender gaps in labour outcom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olicy Brief.

Natajara, M., Schmuhl, M., Sudula, S. & Mandala, M. (2017). “Sexual victim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ublic transport environments: a whole journey approach.”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19(3-4): 168–182. (Special Issue: Women’s victimisation and safety in transit environmen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